

# 「我們 NGO」： 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

許恩恩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吳介民\*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宗棠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施懿倫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

社會運動並不總是齊心團結，甚至常以分裂收場；分裂或鬥爭不必然阻礙集體行動動員，但一場大型抗爭運動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內部團結，才能達成主要目標。「太陽花佔領行動」克服了分裂難題達成團結，促成空前規模與強度的抗爭。本文結合量化與質化方法，透過集體行動與集體認同的交互論證，以波蘭「團結工聯」為參照個案，說明以「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為主軸的「社運團結」形成過程及其內涵。我們首先建構社運組織參與抗爭資料庫，以社會網絡分析社運組織的結盟關係及趨勢，指出在佔領運動爆發前，網絡內部已經趨向更密集且凝聚的結盟關係。接著，透過對社運組織工作者訪談及檔案資料，分析社運組織所構成的次群體文化規範，也呼應網絡分析中以重要事件作為組織間連結合作的基礎。這場運動主框架以「民主」與「抗中」互為表裏，而以「公民社會」作為集體行動框架。太陽花不只是一場「學運」，而是涵蓋更廣闊而持久的一場「公民運動」中的一系列大規模抗爭動員。

關鍵詞：社會運動、抗爭政治、太陽花佔領運動、社運團結、中國因素

台灣社會學第 38 期（2019 年 12 月），頁 1-61。DOI: 10.6676/TS.201912\_(38).02

收稿：2018 年 3 月 27 日；接受：2019 年 12 月 5 日。

\* 通訊地址：11529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Email: wujiehmin@gate.sinica.edu.tw

# The Story of “We-NGO”: Explaining the Networks and Solidarity of the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En-en Hs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Jieh-min W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Tsung-tang Le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I-lun Shih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Rather than embodying solidarity, many social protest movements have ended in internal schism. The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of 2014, however, overcame the solidarity problem and resulted in what was to be an unprecedented protest in modern Taiwa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both its duration and scale of mobilization. This movement involved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 move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activists, who mobilized resources and devoted themselves wholeheartedly to supporting the 24-day occupation. The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originated in a campaign against the Cross-Strait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 (CSSTA) signed by the ruling Kuomintang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13. In the wake of that signing, social movement groups forged an umbrella organization, Democratic Front, to campaign against the CSSTA and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subsequent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This paper, employing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and using the Polish Solidarity Movement as a reference case, explains the origin of movement solidarity within the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Methodologically, we used a triangulation strategy composed of quantitative network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The network analysis demonstrates trends in the cross-issue mobilization of the social movement sector and how intensified co-operation led to a high level of coalition, which was indispensable for movement solidarity. Interviews with social movement activists illuminate the micro-processes and dynamics of network-formation, norm-making, and solidarization within the movement circle. The movement's master frame is constituted of “defending democracy” and “fighting China,” while adopting “civil society” as a collective-action frame. In these ways, we reconstruct the “We-NGO narrative” that activists invented during the movement to strongly express their mutual trust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represents not merely a student movement, but a series of large-scale protests of a broader and lasting civic movement. This paper thereb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eventful mobilization.

*Keywords: social movement, contentious politics,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movement solidarity, China factor*

我覺得 NGO 內部是蠻團結的，就是有點被學生排擠啊、被媒體排擠啊，大家也覺得要成就這場運動，願意多犧牲自己角色。我覺得現在跟大部分 NGO 夥伴蠻好的，其實是因為三一八的過程。<sup>1</sup>

## 一、問題意識

在大規模集體抗爭中，社運團結並非常態；相反地，運動團體之間的矛盾、分裂、與鬥爭屢見不鮮。<sup>2</sup> 既然社會運動與群眾抗爭並不總是能夠達成「團結」的局面，為何有些集體抗爭可以達成團結，另外一些卻在分裂中落幕呢？社會運動與團結的關係，存在多種可能性。誠然，社運內部的分裂或鬥爭並不必然阻礙集體行動的動員，但是一場大型的抗爭運動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內部團結，才能達成主要目標。這是本文的一個論證重點。在太陽花運動中，不同團體存有「抗中」、「反威權」、「反國民黨」等不同動機，而本文即在論證，這些抱持不同理念動機的團體如何在一場大型抗爭運動中克服彼此分歧，克制歧見，嘗試協力合作，或至少不造成毀滅性的破壞力量，避免運動在關鍵時刻分裂或潰散，並達成團結合作局面。

所謂社運團結（solidarity），不只是集體意識的展現，還需要

---

1 受訪者 A015。

2 例如，何明修比較了台灣太陽花運動和香港雨傘運動，認為雨傘運動內的分裂（schism）問題明顯（Ho 2019: 89-91）。Francis L. F. Lee 和 Joseph M. Chan 則透過雨傘運動現場調查指出，運動過程中的分歧（division），不但沿著不同意識形態、不同佔領區，以及對不同政治團體支持而浮現，更與所使用傳播媒介有關係，後者還強化了運動內既存的組織與意識形態等分歧（Lee and Chan 2018: 145-147）。在埃及 2011 年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中，學者透過比較觀察埃及革命的過程以及之後的變化，指出埃及革命 2011 年 1 月底到 2 月中所展示的結盟、團結與動員，成功促成穆巴拉克總統辭職下台，但此後，在 2014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這個時間段，運動內不同政治立場開始相互攻擊產生分裂，讓軍方的反革命鎮壓有機可趁（Abul-Fottouh and Fetner 2018）。又例如，烏克蘭的 Euro-Maidan Revolution，雖然有強力的動員能量，並在烏克蘭政府強力鎮壓後一度短暫結盟，但無可否認的是，烏克蘭國內長期存在的意識形態、族群和語言政治、經濟社會與外交政策等不同面向的分裂立場（左右翼分歧，或是親西方或親俄羅斯的分歧）導致運動內部難以協調整合，而產生對立以及激烈的攻擊（Ishchenko 2016: 35-36; Onuch and Sasse 2016; Way 2014: 41-42）。

集體行動層面的具體實作。本文處理太陽花運動的社運團結，先從佔領爆發以前的動員過程與合作行為切入，也就是 2012 年起由抗爭事件構成的社運組織網絡，呈現集體行動的網絡型態朝向凝聚（cohesion）的結盟關係；接著再透過訪談以及當時的檔案文件，切進行動者意識及認知層面，深度描繪集體認同的狀態，以及結盟與構框擴大的過程。我們以網絡分析資料與田野訪談資料互相補充，交互論證了集體行動與集體認同的關係，構成了本文所稱的社運團結。

2014 年，同樣面臨「中國因素」的台灣與香港，都爆發了大規模群眾抗爭。香港的「雨傘運動」以分裂局面收場，也沒有爭取到特首與立法會雙普選的目標；而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雖然歷經分裂危機，卻維持住團結的局面，最後達成了抗爭目標，無限期擱置了「兩岸服貿協議」。嚴格而言，「太陽花佔領」乃是指涉長達 24 天的一系列相關抗爭事件，而這場抗爭則延續自 2013 年 6 月即已經啟動的「反服貿運動」。對照而言，「反服貿運動」是從 2013 年 6 月一直延伸到 2014 年 4 月的一場組織化集體抗爭，這場抗爭更接近一般社運理論上的「社會運動」；而太陽花佔領行動則屬於這場廣闊運動中的一系列抗爭事件。<sup>3</sup> 然而，基於約定俗成，本文使用「太陽花運動」來指涉這場抗爭動員。再者，「太陽花運動」從 3 月 18 日爆發，期間不只是發生「佔領立法院」事件，還曾發生「佔領行政院」事件，以及同期間發生在台灣各地的許多抗爭行動；在 2014 年 3 月到 4 月期間，全國各地發生了 94 件與中國因素相關的抗爭事件（Wu 2019: 225-226）。這些集體行動涵蓋不同的組織與行動者，也包括那些反制「抗中行動」的抗爭。但本文以「太陽花佔領行動」作為分析的焦點。

太陽花運動將「中國因素」論述主流媒體化；其後續結果，使國共合作正當性受到質疑，延緩中台經貿整合，並牽動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結構，促使年輕人更加關心公務事務、組成社團甚至投入選

---

3 關於「運動」或「抗爭事件」的思辨，我們參考了劉華真（2015）的見解。

舉，甚至導致國民黨在後續選舉的崩盤（吳介民、廖美 2016）。有法國媒體認為太陽花運動是政治菁英與青年脫節的後果，並以「台灣之春」類比於發生在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自由時報 2014）。太陽花運動之所以能夠取得豐碩的運動成果，不僅僅是靠著學生的力量，也與運動中其他「次群體」<sup>4</sup>的運作與奉獻，以及不同次群體之間維繫著彼此的合作關係有關。這個研究嘗試釐清太陽花運動當中社運組織的參與角色，並以量化網絡資料及深度訪談來論證佔領過程中所創造的「社運團結」。

太陽花運動被主流媒體與社會大眾視為一場「學生的」運動。然而，在學生自發參與及網路動員的討論外，太陽花運動的組織基礎卻時常被社會大眾乃至學術研究所忽略。首先，在來自不同領域的社運組織肩負了運動現場內外的各種工作，包括議場外秩序的維持與活動的安排、部分資源的募集與分配，以及參與重要決策的討論（晏山農等 2015）。其次，這群社運組織的工作者，其實早在太陽花運動爆發前半年多便已經組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投入反服貿運動之中。<sup>5</sup>在太陽花運動爆發的現場，社運組織者奔走工作，但當媒體將鎂光燈聚焦於學生，其身影則顯得模糊。因此，鮮少有人注意到，社運組織在太陽花運動時大規模的結盟與合作，對運動動態過程所具有的重大意義；甚至忽略社運組織串聯的歷史基礎。

## 二、文獻回顧

### （一）被忽視的社運組織與團結

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社運組織至少在兩個層面上未獲足夠重視。

---

4 「次群體」在本文中是指在佔領運動中，在大的結盟團體（例如學生與 NGO 所組成的結盟團體）中的群體，例如由 NGO（社運組織）構成的次群體；同樣的，學生這個群體也分成若干次群體，包括「議場次群體」和「社科院次群體」等。

5 根據「經濟民主聯合」官方網站於 2014 年 12 月 9 日的專文「回顧：從反黑箱服貿到經濟民主連合」指出，2013 年 7 月 28 日為抗議兩岸服貿協議的簽訂，各團體於濟南路立法院旁舉行「民主團結之夜」，並宣布成立「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https://dfactsa.wordpress.com/>，取用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其一是眾多社運組織扮演的組織與動員的角色；其二則是社運組織早在反服貿時期就開始投入相關集體抗爭，而這些事實關係到佔領行動的維持。如果沒有多個核心社運組織早期的參與及投入，以及彼此長時間培養默契及配合協調經驗，而後將這種社群的凝聚力延續到太陽花運動面對大量群眾的組織工作中，則太陽花運動能否「達成一定目標」或許還未可知。因此，從早期參與到後續太陽花運動的爆發，兩者之間應拉出一條運動動態的時序軸線。以更寬廣的視野觀察，社運組織間合作與「政治行動」的重疊，其實早在反服貿之前便已出現，橫跨多個運動議題，而且不僅限於兩岸經貿議題。<sup>6</sup>

本文所稱的「政治行動」是指，行動參與者在參與具有高強度的抗爭時，對局勢所作出的判斷、實際的行動抉擇與作為、以及與政治場域進行的互動。當諸多社運組織同時聲援或參與一項抗爭，即顯示他們對這個議題具備相似、或至少可以並容的政治判斷。社運團體之間的政治行動的趨勢究竟是傾向團結或分裂，則影響了集體抗爭者之政治行動的決斷、過程、與結果。

然而，我們不能將一個大型集體抗爭中各個社運組織間的團結視為理所當然；相反地，這類型抗爭通常都充滿著分裂的因子，例如對政治機會的不同評估、對政權反應的分歧態度、路線之爭、或運動權力分享等等。例如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多元而潛在路線分歧，「當（佔領）營地被清空，大會立刻分崩瓦解」（Graeber 著、李尚遠等人譯 2014: 207）。<sup>7</sup> 回顧台灣過去的社運研究，對「團結」

6 編委會提問：台灣的社運組織規模相對較小，其「組織性」邏輯是否因此受限定？社運組織間的「集體認同」與「社運團結」，會不會只是少數團體幹部之間的彼此信任？本文透過組織幹部訪談資料以及相關會議檔案發現，情況並非如此。在太陽花運動爆發時，社運組織成員必須要「放下原來的日常工作」而投入參與佔領運動，過程甚至需要在各自組織內部開會做出決議方能決定參與方式；亦有組織幹部表示，他們原本不會積極參與非自身專業性的議題，投入太陽花運動需要先進行內部溝通；亦有組織幹部在投入佔領運動的分工當中，由於參與會議的代表性問題而產生團體內部衝突。這種現象顯示，組織幹部仍遵循著「組織」邏輯而影響他們參與這場行動，並非只是由少數代表幹部間的信任關係即可決定運動走向與推動方式。因此，台灣社運場域的規模相對於大型國家確實較小，但是其組織性的邏輯仍是清晰可見。

7 David Graeber 指出佔領運動分崩離析的原因有三個：警方改變戰術、自由派盟友的背棄、以及媒體切斷訊息（Graeber 著、李尚遠等人譯 2014: 208）。



一詞的使用乃是多元而歧異，本文希望透過較具歷史感的文獻回顧及不同觀點的交互驗證來梳理其意義。劉華真（2010）挖掘二戰後到 1970 年代的工人抗爭事件，發現早期礦業勞資爭議中，存在著某個意義上的礦工之間的團結；而從當時為數不多的勞工抗爭資料中，也觀察到工人之間的團結關係與網絡支持。但是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尚無法確知當時的工人組織之間的網絡關係為何。吳介民在研究 1980 年代台灣的社會抗爭中，發現一些抗爭群體之間存在著分裂狀態，並指出造成分裂的因素，一方面可溯及政治權力的追逐與鬥爭，另一方面也指向了知識分子在參與草根運動過程中的偏執與烏托邦理念（吳介民 1990: 157）。吳介民的論文也同時指出在解嚴之前的「自力救濟」集體抗爭中，除了知識分子（團體），黨外（民進黨前身）也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與協調角色。但是，何明修（2001）論證，在解嚴前環境運動的開端期，知識分子與黨外對運動的介入乃是片面而間接的，草根民眾的自主力量才是推動環境運動的主力。這個爭議目前恐怕尚無決定性解答，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當時的專業社運團體的組織化仍未成熟，恰好對照出晚近抗爭場域中專業化社運組織與公民團體的關鍵角色；這正是本文的探討重點。此外，在台灣工會組織化脈絡中，團結的局面也經常難以出現。何明修（2016）在追溯台灣勞工階級型塑的過程中，指出因為制度等因素而導致國營企業員工在組織與行動協調等方面「支離破碎」的結果。因此，社運團結不能視為理所當然，它經常是一個需要解釋的謎題。規模空前的太陽花佔領行動過程，團結局面的維繫，更亟需一個清晰的解釋架構。

從理論的角度，本文將論證：社運團體既存的網絡關係，一方面有助於團體之間的訊息傳播與溝通，並促成抗爭框架的形塑與擴大，另一方面則有助於建立因為共同的政治行動、甚至共同面臨危機威脅而來產生的集體認同感；良好溝通與集體認同都有助於擴大團體之間與團體內部的信任關係，而因為信任關係構成的社運團結，才能夠對應高張力抗爭動員中的危機威脅與資源和心力耗損。既有文獻中有的研究成果強調網絡與溝通的關聯，亦有強調文化認同感與團結的

關聯，但尚未見對此完整理論命題進行各個環節的連結。我們將在後續分析提出討論。在經驗研究方面，本文將論證，在一個長期經營的公民社會脈絡中，社運組織歷經多次直接或間接在不同場合的溝通與合作機會，逐步建立了社運組織間基本的認識與信任關係，形成凝聚性的社群連帶。而這些過往合作經驗，都為太陽花運動大規模動員下的組織與行動，打下紮實的根柢。事實上，長期以來，議題導向的社運組織大多時候都忙於各自的議題當中，互相聲援的狀況並不普遍。然而，從 2012 年開始，集體抗爭事件蓬勃發生、聲援群眾的基礎擴大，種種原因使得跨議題的橫向串聯變的更加頻繁。這樣的趨勢不只提供了社運組織合作的機會，也在集體抗爭事件頻繁發生的過程中，使得各團體得以深化論述、演練抗爭方法及手段。直到太陽花運動期間獨特的佔領劇碼，讓各個社運組織有機會在短時間內展現高度凝聚的向心力與密切結合的工作模式，促成團結合作的局面。

基於此，本文核心關懷在於：在太陽花佔領行動爆發以前，社運組織在什麼時間點，基於什麼互動模式，產生政治行動的交集，並進行跨議題結盟？社運組織如何在這樣的互動中形塑出社運組織的社群價值與文化，其在太陽花佔領行動中所展現的「團結」具體內涵是什麼？本文的問題意識不在檢證太陽花佔領行動是否為「學運」，而是在凸顯「學運」之外的抗爭圖像，呈現社運組織的結盟與團結所協助促成社會抵抗的歷史圖像。為了觀察社運組織相互結盟的政治行動過程，我們收集了太陽花運動發生前兩年的社運組織資料，整理了 2012 年至 2014 年 3 月的重大抗爭事件及其參與組織的清單，也就是本文所謂社運組織的「抗爭參與」網絡資料。

## （二）社運網絡與團結

過去，社會網絡分析學者 Peter S. Bearman 和 Kevin D. Everett (1993) 透過華盛頓郵報的長期資料登錄，觀察美國的社運與政治組織之間透過抗爭事件所產生的連結。組織透過抗爭的參與形成了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可以幫助理解不同議題性質的社群在不同時間所



扮演的角色，並藉此去驗證一些理論上的問題。Dan J. Wang 與 Sarah A. Soule（2012）也透過紐約時報的長時間資料庫登錄大量的抗爭事件，並分析社運組織之間策略擴散的機制，更進一步推展了量化的社會網絡分析在社運組織研究領域的應用。由此可見，抗爭網絡的資料能夠在抗爭的現象層次提供研究者一個較為宏觀的視野。從社會網絡觀點來研究社會運動，透過行動者的結構位置與群體關係的角度，有助於我們澄清一些關於社會運動概念的含糊之處。早期，網絡觀點應用在社會運動研究，大多關注的是個體參與集體行動的機制，近年則更多關注無論是個體或組織之間的連結結構。社運組織之間的網絡能夠促進組織領域的動員與分配資源、信息傳播、協調目標，也可能促進意義和相互承認（Diani and McAdam 2003: 3）。從社會抗爭動員過程中觀察到的組織之間的合作與凝聚關係，並不能直接推論出這些團體之間具有「團結」關係。從方法論的觀點，社運團體之間的團結關係，需要藉由對行動者（包含個體和團體）的意義建構做出「詮釋」，才能具有解釋上的效度。因此，這個研究步驟需要使用田野訪談的方法才能夠獲得論證所需的資料。我們將在下文田野訪談資料的章節呈現該詮釋論證。以下先回顧與團結議題相關的文獻。

社會運動研究中使用「團結」（solidarity）這個詞彙的概念化程度較低。論述時經常是與「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概念混用，或者以「集體認同」作為「團結」定義的核心（Hunt and Benford 2004: 439）。集體認同的重要性在社會運動研究中已經被大量討論（Melucci 1989; Polletta and Jasper 2001；Taylor and Whittier 1992）。少數將兩者做出區分的 William Gamson（1991: 45）則指出「團結」和「集體認同」是交織的兩個概念：集體認同是建構「我們」的過程，團結則是對於集體認同的忠誠與奉獻力量，需要個人的犧牲。由此定義而言，「團結」是一種較之「集體認同」更加具體，也是強度較高的一種型態。

Sidney Tarrow（2011: 143）在回顧社會運動的意義建構時，在社會運動研究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脈絡下，將社運團結

(movement solidarity) 視作「集體認同、情感、構框」三者的交集。意即，除了上述強調的集體認同之外，在描述社會運動的「團結」時，需將情感的影響力以及運動構框的效果一併納入，才能凸顯「團結」這個概念的特性。早在 1960 年代，社會運動研究從集體行動視角出發，擺脫將社會運動視為「非理性」的情緒與衝動的產物，而發展出理性選擇觀點的分析以及資源動員論。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則將情感因素重新納入分析。如 James M. Jasper (2011: 14.10) 便強調集體認同當中本來就包含了情感的元素，也呼應 Gamson (1991) 對於「團結」更加強調承諾、個人犧牲的面向。David A. Snow (2004: 384) 也曾說明集體行動的構框時，除了要轉換「怨忿」(grievances) 為「不公不義」，也需要區分哪些屬於框內、哪些屬於框外，並整合不同元素來劃定範圍，打造「集體的我」和「集體的他者」，也就會與集體認同的劃界工作相關連。Maryjane Osa (2003) 在研究波蘭的反抗運動（團結工聯運動的歷史形成過程）時，指出不同時期的社會網絡結構有不同的屬性，有些網絡結構較有助於協調集體行動，有些則否。1970 年代後半葉，落在網絡結構中心位置且傾向「意識形態中立」的公民團體，提出「公民社會框架」，使不同立場和性質的組織得以合作，差異雖然存在但不致於破壞整體的團結 (Osa 2003: 132-133, 161-163)。Osa 在其書中強調文化構框對於擴大動員的重要性：「主框架在一波抗爭中，藉由連結組織與運動，而具有宏觀協調的功能；主框架不只是驅動單一團體的訴求」(Osa 2003: 17)。在 Osa 的波蘭個案中，「公民社會」是關鍵性的「集體行動框架」，承擔了在主框架底下的動員與擴大結盟的作用。換言之，在一場大型的抗爭運動中，當參與團體多元而複雜時，框架的包容性對於擴大結盟與動員扮演了關鍵角色。這個觀點也呼應 Tarrow (2011) 將「構框」視為團結要件的重要性。因此，將「團結」視為「集體認同、情感、構框」三者的交集有其道理。在本文的經驗分析中，也將指出太陽花運動中主框架的浮現，進一步促成各個公民團體與社運組織之間的協作與團結。

然而，「團結」作為一個概念變項，也在既有的社運研究當中遇到了一些分析上的難題。什麼原因促成社會運動團結？如同許多研究者混用「集體認同」及「團結」的概念一般，「團結的定義」也經常在研究中被視為是「團結的原因」，而變成套套邏輯（tautology）。S. Laurel Weldon（2006）便回顧過去的研究多把社會運動的團結歸結於幾項因素：共同利益、集體認同、構框過程以及政治機會結構。其中多與前述論及團結的內涵相重疊。以「集體認同」為例，該文便質疑「集體認同」究竟是社會運動的「因」，還是「果」？在 Weldon 在其對美洲婦女運動的研究中，真正促成跨國且異質處境的群體團結的理由，在於運動內部採取「包容性的規範」，使得運動不會否認或升高激進訴求的分歧或衝突，也讓在複雜處境底下處於弱勢的聲音可以獲得一定的處理。

本文延續多數學者對「團結」概念的看法，認為「集體認同」是團結最核心的定義，其中「情感」的元素更強調認同的密度與張力。包容性的「構框」則可能是「結盟」或「團結」的背景。在特定框架的擴大、轉移過程中，或者不同框架的整合之間，會影響組織之間的連結強度。至於能否讓不同框架都被容納在運動當中，是促成「團結」與否的重要因素。綜合上述對團結的理論文獻回顧，本文將團結定義為：主觀集體認同的行動化，表現在促成社運組織內部達成趨向一致的政治判斷，並展示集體行動的意願與實際行動；這些政治判斷與實際行動不完全是出自於理性的資源計算，而是帶有基於結盟過程累積的情感成分的結果。

### （三）對太陽花運動的解釋

對太陽花運動的個案研究，短短幾年已經累積一定程度的研究成果。陳婉琪與黃樹仁（2015）在佔領期間（3月25日至29日）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太陽花靜坐參與者的基本圖像。何明修使用佔領時期的新聞資料與佔領結束後對參與學生、NGO 工作者、志工以及民進黨工作者的深度訪談，建構「政治菁英分歧、中國經濟威脅、運

動策略」的三角互動模型（Ho 2015）。佔領結束後，陸陸續續也有一些學術著作則著眼於分析太陽花運動的網路動員模式，將之視為打破傳統組織動員的新形態社會運動模式（陳婉琪等 2016）。何明修以「臨時應變」（improvisation）來描述這種運動的狀態，強調行動者們未受垂直決策模式架構限制，也非完全水平式的動員，而是以彈性、策略性回應來促成佔領運動（Ho 2018）。此外，楊佳羚從性別角度切入，論述女性抗爭者藉由母職的中介來相互構成其日常生活性別角色與公共領域抗爭身分（Yang 2017）。

在太陽花運動兩週年時出版的《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與視域》，從歷史脈絡、運動結構與過程、法律和個人精神層面等不同視角，描繪太陽花運動的諸多面貌（林秀幸與吳叡人編 2016）。其中，彭仁郁（2016）〈反叛中建構的主體：三一八公民運動中所彰顯的象徵秩序傳承〉討論了三月二十四日佔領行政院의 行動及鎮壓，造成運動內部面對意見分歧，甚至部分行動者因為感到共同體受到撕裂而導致的創傷。林傳凱等人（2016）組成「323、324 真相調查小組」，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分別訪談「323 行政院事件」相關的運動者，試圖重建事件的原貌，也帶有試圖修復運動傷痕之用意。<sup>8</sup> 值得注意，行政院佔領行動雖然隱含了運動走向分裂的潛在誘因，但並未造成太陽花佔領行動整體的挫敗，甚至反而促成抗爭行動者的再集結。要解釋佔領行動為何能夠維持並取得一定成果，我們必須關注運動中的不同行動者在佔領時所扮演的角色，此即本文的核心論證，社運組織之間的分工合作，協助促成了運動的整體團結局面。

關於佔領行動中社運組織的角色，徐斯儉訪談了「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組織幹部，分析不同組織經由「跨海峽政商影響力、民主人權、全球化、運動夥伴」等四種「路徑」來認識反服貿議題以及「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响。因馬政府這個「共同敵人」，提供不同議題團體動員匯聚的契機，在此過程中團體間相互學習抗爭戰術，形

---

8 2016 年 3 月 24 日林傳凱臉書網誌。

成「涵蓋更廣、關係更緊密的團結網絡」（Hsu 2017: 134）。徐斯儉著重「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策略結盟下，各組織成員對反服貿運動構框的形成。何明修在其新書（Ho 2019）也留意到社會運動中團結（solidarity）與分裂（schism）的議題：他指出，對比於香港雨傘運動的分裂，他認為台灣的太陽花佔領及運動的後續發展，呈現了團結的樣貌。為解釋這個差異，他指出台灣原先存在一個相對穩固且較具共識的運動網絡（network），使得內部的意識形態爭鬥日益成為次要議題，特別是在 2012 年反媒體壟斷運動之後，有著相對一致且鞏固的政治立場；相較之下，香港的運動網絡就深受新興的本土派網絡行動社群的挑戰——特別是在於面對中國的立場差異上，因而使得運動內部出現明顯的分裂。徐斯儉跟何明修雖然分別從跨組織的策略構框以及佔領爆發前已經存在的運動網絡兩個方向切入，而提及團結網絡，但並沒有將抗爭運動中的團結，以及構成團結的互相信任與集體認同本身，置於研究議題的核心位置，做細緻而微觀的動態分析。此外，Anson Au（2017）則是從社群媒體為主的線上文本，探討太陽花運動跟雨傘運動的集體認同、運動團結跟分裂的差異，但他沒有討論運動團結的基礎是由運動組織長期積累才得以形成，而不僅從媒體跟線上活動的表現來衡量。吳介民與廖美（2016）分析太陽花運動的前因後果，描述動員過程現場組織分工與實作，並解釋在立法院外圍負責後勤支援的諸多團體背後的網絡關係。

在運動論述框架的形成上，吳介民論證，台灣大約從 2008 年開始針對「中國因素」（中國影響力或銳實力）展開的集體抗爭，經過了一個長期的論述框架形成的過程，「中國因素」在 2013-2014 的反服貿運動中成為一個主流媒體用語，「正視中國因素」成為街頭抗爭的論述，其實是社運團體內部經過長期的爭辯與磨合的結果，這個過程與社運團體參與者之集體認同的轉化息息相關。因為「抵抗中國」容易被抗爭對手連接到「台獨」並加以「污名化」，因此這個論述轉化過程，不論在社運圈或公眾論述場域，都歷經一段長期的醞釀（Wu 2019）。因此，究竟是否將「中國因素」作為太陽花佔領運動



檯面上的主論述，是否與「傳統獨派」結盟，都在社運團體之間經過一番折衝（詳下文深度訪談部分）。

呼應上述文獻研究成果的檢討，本文將進一步結合量化與質化分析，解釋社運團結如何在長期的運動過程中逐漸形成，並在太陽花佔領中展現關鍵的作用。我們將以量化的網絡分析來論證，不同團體在太陽花佔領之前的合作經驗，已經為社運團結創造了在佔領期間結盟合作的必要條件，從而能夠在佔領現場的共同行動中，進一步創造更為緊密的互信與合作。正是這個長期磨合的動態過程，團體之間的溝通與互動，促成了太陽花運動的團結局面。本文從社會網絡分析呈現 2012 年至太陽花佔領時社運組織的連結趨勢，並且進一步分析 2014 年 3 至 4 月的佔領時期，社運組織在佔領情勢之中微觀的互動狀態，強調信任關係、集體認同、與團結在太陽花佔領所發揮的作用。

### 三、分析架構及研究方法

由於本文主張社運團結不僅是集體認同的展現，而且是立基於集體行動的實作。因此，本文的分析架構是先確立集體行動的樣態，再進入集體認同的描繪。

本文第四節先是透過以抗爭事件的公開資料所構成的量化網絡資料，考察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的社運組織結盟程度變化，確立太陽花佔領行動以前的集體行動型態，不僅是呈現社運組織在不同抗爭事件的動員過程，更進一步透過「雙組元」網絡指標來確立社運組織社群在行動上已經構成一種跨議題性的較為緊密的關係。這種凝聚的網絡型態也在質化田野訪談當中得到了與集體認同相互關連的佐證，是進一步橋接到社運團結的必要構成。接著在本文第五節，將質化資料更深入到佔領當下的行動者認知、意識層面的內涵，補充從外觀的行動面所無法描繪的社群運作文化。同時，構框與結盟的擴大，也回頭呼應網絡資料所呈現在太陽花佔領行動前幾年的抗爭事件所醞釀與累積的過程。

雖然我們在分析順序上先以網絡資料呈現集體行動樣態，但對集體行動的描繪卻不止於量化數據的呈現，還進一步從田野訪談資料進行雙重確認。透過構框的分析，我們也才能夠確立太陽花時期的集體行動現象是以有意識的結盟合作為基礎。因此，這兩組資料之間是相互呼應與佐證的關係。本研究使用的經驗資料，主要收集自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sup>9</sup>

### （一）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社運組織參與集體抗爭事件的資料，分為「事件」與「組織」兩種類型。「事件」的選取來源，主要是以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這段時間的資料，逐月瀏覽當時較完整且有系統收錄抗爭新聞稿與相關報導的網路媒體，包括「苦勞網」上「行動行事曆」的採訪通知與新聞稿，以及「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的報導，<sup>10</sup> 並諮詢數位不同領域、活躍於街頭抗爭的積極行動者與社運組織工作者，請其參考初始名單加以增刪後收集而成。接著根據議題性質、發生地點、動員規模、抗爭強度、媒體關注度等因素的綜合考量下，挑選出 47 個集體抗爭事件。然後從這 47 個事件中，依序搜尋其官方網站、Facebook 活動頁、記者會新聞稿、以及相關報導內容，收集曾參與該事件的社運組織，登錄到對應於事件的「組織」列表中。

組織方面，本文主要關懷對象為社運組織的抗爭參與及政治行動的結盟。公民團體和工會系統皆統稱為「社運組織」，但團體資料排除企業、立法委員辦公室、校園異議性社團等團體。這並不表示相關組織不重要，而是因為這些團體聲援集體抗爭事件的型態、邏輯與一般社運組織有所不同，不是本文所能處理的對象。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資料諮詢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許多校園異議性社團有實質參與某

9 本文使用的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資料，包括「全球化、中國因素、政經社會變遷、與社會抗爭：台灣與香港比較」以及「搜尋政治力位移的因素：社經條件變遷、政治抗爭週期、民意變動趨勢，台灣 2000-2016 年」兩個計畫，主持人為吳介民。

10 苦勞網「行動行事曆」自 2012 年 1 月起開始收集每日發生的抗爭事件與新聞（<http://www.cooloud.org.tw/action>，取用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些事件，卻在事件的公開資料中未被納入團體名單。本文認為如欲分析企業、立委辦公室、校園異議性社團等團體的抗爭參與，需額外從其他來源收集資料，且不宜忽略其行動的特殊性。<sup>11</sup>

「抗爭參與資料」包括 47 個動員規模不一的抗爭事件（表 1），以及參與其中的 327 個社運組織。本文將依「事件—組織」的資料結構，建立雙邊網絡（bipartite networks）以分析社運組織間的抗爭參與狀況。由於本文關注社運組織間基於政治行動的重疊而產生的互動關係，因此藉由多重的「事件—組織」對應關係，可以建構出整體社運組織的抗爭參與圖像。<sup>12</sup> 即便每個抗爭事件可能具備不同的結盟型態與抗爭形式，且同一事件中各組織的參與、結盟深度亦有所變異，此分析仍有助於我們觀察社運組織的政治行動所形塑的互動結構。

為了便利後續的分析，本文將各事件予以一個確切的發生時間點，並逐一編碼（最小時間單位為「月」）。如果該事件不是一天內的短期行動，就會根據其動員人數、抗爭強度及被報導數量的高峰來標示時間點。在組織間抗爭參與的凝聚變遷的分析中，為了處理短期互動可能產生的遲滯效應（lagged effect）與短期累積效應（cumulative effect），本文選擇以 6 個月做為每個「時間段」的基本單位長度。而一個時間段到下一個時間段之間每次只移動 1 個月（代表有 5 個月是相互重疊的），藉此更細緻的觀察抗爭參與網絡整體的變化。<sup>13</sup> 此緩衝空間（buffer）較為寬鬆的定義了頂點間的連結狀態，此法乃沿用過去學者在動態網絡的分析方法（Kossinets and Watts

11 本研究收集的網絡資料並未排除「學生團體」，而是不收錄「校園內異議性社團」。若是以議題性質為組織核心或具有跨校性串聯的團體，便有收集到網絡資料當中。例如：「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等。

12 在雙邊網絡中，有兩組不同層次的頂點（vertices），組內各點不會直接連接，連結只存在組與組之間（Wasserman and Faust 1994）。其意義在於可以藉由觀察行動者在各空間的連結（join space），考察行動者間彼此隸屬的社交圈（social circle）有多大程度的重疊，甚或分析行動重疊之處。過去已經有大量的研究者將此分析技術應用在社會科學家、藝術家的合作網絡（Moody 2004; Uzzi and Spiro 2005）、企業間的董監事網絡、持股網絡（李宗榮 2007）。

13 資料自 2012 年 1 月開始至 2014 年 3 月結束，因此舉例來說，第一個「時間段」為 2012 年 1 月至 6 月，接著第二個「時間段」為 2012 年 2 月至 7 月，以此類推，總共包含 22 個「時間段」。因此，可以依照 22 個時間段建立 22 個不斷變遷的社運組織參與網絡。

表 1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主要社會運動列表

年度	事件名稱	日期	年度	事件名稱	日期
2012	2012 圖博遊行	3.1	2013	反美麗灣	4.19
2012	2012 反核遊行	3.11	2013	2013 五一遊行	5.1
2012	文林苑事件	3.28	2013	拉瓦克抗爭	5.21
2012	反美牛	4.1	2013	2013 六四晚會	6.4
2012	2012 五一遊行	5.1	2013	反服貿	7.28
2012	2012 六四晚會	6.4	2013	萬人送仲丘	8.3
2012	鍾鼎邦事件	7.31	2013	大埔事件佔領內政部	8.18
2012	抗中事件	8.8	2013	反南鐵東移	8.27
2012	華隆罷工	8.17	2013	凱道伴桌	9.5
2012	反媒體壟斷	9.1	2013	公民升旗典禮	10.1
2012	2012 反共事件	9.15	2013	青年佔領凱道行動	10.8
2012	知本卡地布反遷葬	9.21	2013	2013 同志遊行	10.3
2012	反高學費	10.3	2013	全代會丟鞋	11.1
2012	2012 同志遊行	10.3	2013	2013 秋鬥	11.2
2012	2012 秋鬥	11.3	2013	2013 反共事件	11.3
2013	民進黨火大遊行	1.13	2013	日月光事件	12.2
2013	糧食主權	2.3	2013	移工遊行	12.2
2013	全國關廠工人臥軌	2.3	2013	航空城	12.2
2013	2013 共生音樂節	2.28	2013	不要核四五六運動	12.3
2013	2013 圖博遊行	3.1	2014	2014 共生音樂節	2.28
2013	2013 反核遊行	3.9	2014	2014 反核遊行	3.8
2013	樂生遊行	3.16	2014	2014 圖博遊行	3.9
2013	華光強拆	3.27	2014	太陽花佔領運動	3.18
2013	苑裡反瘋車	4.6			

註：日期為抗爭事件之高峰日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006; 2009)。此分析策略對本文的另一個優勢在於，有些抗爭事件可能為期數月之久，但本文在編碼時會依據抗爭高峰，將之歸類在一個時間點，而這種較具彈性的分析方式將使整體網絡結構不至於太過失真。

## （二）深度訪談方法

本研究團隊從 2016 年 5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間，訪談了 22 位活躍於社會運動場域，並曾任職於社會運動組織的行動者，其中女性 9 位、男性 13 位，年齡介於 30 歲至 45 歲之間。所有受訪者，包括社運組織及其他身分在內的 59 位受訪者，訪談名單依照訪談日期順序進行編碼，置於本文附錄 2，並附上所有受訪者所屬的社運組織清單。每次訪談約 2 至 3 小時。訪談內容包含行動者個人的社會運動參與歷程，其所屬組織的內部運作與決策機制、該組織在重要抗爭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等，也包含對於近年內幾個指標性運動的參與過程。透過行動者的自述，觀察集體認同在不同運動及抗爭事件當中的變化，也透過其對不同議題的判斷來理解構框在運動中的作用。為使行文順暢並精簡篇幅，本文質性分析部分並未引用所有受訪者的證詞，但這些社運組織受訪者及「非社運組織」如學生、青年等其他行動者，能夠提供研究團隊更準確描繪整體佔領運動的圖像。透過大量訪談不同位置、身分的行動者，亦能補充核心社運組織觀點以外的視角，以交叉確認訪談證詞與檔案資料內容的可靠性。

在評估受訪者名單時，我們也同步考慮議題屬性的多樣性，並參考網絡資料當中對於社運組織作為個體行動者的指標。過往的文獻討論中，社運組織網絡內有些行動者被認為是能夠促成團結的重要角色。Diani and McAdam（2003）指出網絡當中行動者的權力和影響力是否與「網絡位置」相關，其中，除了傳統較接近領導角色的代表性組織之外，能夠與不同部門溝通的中介角色（broker）可能在串聯組織間的合作中扮演更重要角色。Brian Mayer（2009）透過勞工運動與環保運動之間的結盟，提到在型塑跨組織的集體認同時，橋接者扮演了關鍵角色。Nella Van Dyke（2003: 229）則認為多議題的社運組織（multi-issue organization）能夠促進運動內部和跨運動間的結盟，建立個人和組織之間的連結，促成更進一步的組織合作。本文在網絡分析的部分並不著重在辨認哪些組織是較為重要的行動者，而是聚焦在整體社群內部的凝聚關係，但在確認受訪者名單是否有所遺漏時，亦



參考了社運組織的網絡中心性、結構限制性網絡指標來協助評估和搜尋。

後續質性分析大部分針對「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之社運組織。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是 2013 年 6 月為了監督「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而成立，一開始組成包括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台灣勞工陣線、婦女新知基金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監督健保聯盟、老人福利推動聯盟、殘障聯盟等。隨後於七月底「民主團結之夜」晚會後擴大結盟，在太陽花佔領行動前後又再次擴張團體成員數量。在太陽花佔領行動後因關注議題領域超出原先「反黑箱服貿」的議題範圍，於 2014 年 9 月改名為「經濟民主連合」，至 2017 年底總共有三十七個組織成員。<sup>14</sup> 值得一提的是，跨校學生組織「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也屬於「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一員，且早在太陽花運動爆發以前就持續監督兩岸服務貿易協定。但在佔領期間的實際分工和行動者認知的人群分類中，較被歸類為「學生」而非「NGO」社運組織。這種在佔領期間具有特定意義的人群分類，會在後文詳加說明。

## 四、抗爭風潮： 2012 年至太陽花的整體網絡圖像

本文資料起始點 2012 年至太陽花爆發的 2014 年 3 月，對台灣社會具有獨特的意義。2008 年金融海嘯後，經濟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的風潮在全球許多地方帶來社會衝擊，並開始出現如「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等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Moghadam 2012: 133-170）。台灣沒有自外於這波經濟衝擊。貧富

---

14 參見「經濟民主連合」官方網站（<https://dfactsa.wordpress.com/2014/12/09/> 簡介：經濟民主連合 /，取用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差距逐漸擴大，青年世代對於未來的焦慮感上升（林宗弘 2015）。內政方面，2012 年是馬政府第二任任期的開始，許多人質疑政府在沒有連任壓力下，多次採取強硬的方式處理重大的社會問題，引發更劇烈的社會衝突，我們將於下文透過網絡圖簡述幾項主要的社會抗爭。這一節透過社會網絡分析，將會確立「跨運動結盟」在 2012 至 2014 年的逐漸形成的現象。Van Dyke（2003）將「跨運動結盟」（cross-movement coalition）定義為參與在不同的單一運動跟議題的團體都投入的抗爭事件。本節則會說明這種隨時間累積而越趨穩定的網絡連結，是奠定太陽花佔領行動時社運組織凝聚集體認同的基礎。

本文以下分析將根據不同時期社運組織的抗爭參與網絡，劃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分別是 2012 年初至 2012 年末的「鬆散連結時期」、2013 年初至 2013 年 10 月的「規模擴張期」及 2013 年底至 2014 年 3 月的「高度內聚期」。不同時期的社運組織網絡不只在互動結構上有差異，且將組織串聯的抗爭事件類型也有所不同。

在進入各階段的分析前，以下將先扼要的描述此段時間社運組織抗爭參與網絡的基本特徵，並闡述幾個重要的事實。本文資料呈現，抗爭事件的平均「參與組織數」（ $x=16.96$ ）要遠多於社運組織的平均「抗爭參與數」（ $x=2.44$ ）。超過一半（50.8%）的社運組織只參加過一個抗爭事件，接近 7 成（68.5%）的社運組織參加不超過兩個抗爭事件。可以說幾乎沒有單一組織具有強大的連結能力，能夠通過參加各種不同的事件，串聯具異質性的不同社運組織。<sup>15</sup> 抗爭事件則不同，將近三成（28%）的事件有超過 20 個組織參與，少數大型事件甚至有 40 個以上的組織參與其中。換句話說，在社運參與網絡中，組織間的串聯多數時候並不能仰賴少數核心組織穿針引線，而是以圍繞抗爭事件的社運組織叢聚（cluster）模式為基礎，再透過組織跨議題的抗爭參與，產生整體的串聯。

---

15 在資料中唯一的例外是「台灣人權促進會」，該團體總共參與了 21 個抗爭事件，橫跨人權、土地、勞工、環保等多種運動。

圖 1 使用網絡中心性的概念，進一步呈現此時間段中擴張參與網絡內重要的抗爭事件。我們採用的指標包括原始二元網絡的點度，並採用 M. E. J. Newman (2001) 的射影法 (projection) 轉換為「事件與事件」的加權單元網絡 (weighting one mode network) 後計算的加權點度與加權中介中心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Opsahl et al. 2010)。<sup>16</sup> 關於具體操作技術請參見附錄 1。點度指的是連結的數量，以社會網絡的觀點，頂點的連結愈多，表示頂點有更大的（直接）影響力與能見度 (Borgatti et al. 2013: 165-166)。在抗爭事件網絡中，即表示該事件有更多的組織參與其中。中介中心度則表示頂點多少程度居於網絡中重要的橋樑位置 (Freeman 1978)。在加權事件網絡中，具有中介性質的事件代表其位在網絡中不同區塊頂點的匯聚處。於社運網絡來說，中介性高的頂點表示此事件的參與組織，較高程度地參與了其他網絡距離較遠的抗爭事件，拉近了社運社群的距離。

在圖 1 中，高中心性的抗爭事件多是週期性事件，如「反核遊行」與「秋鬥」。太陽花運動是少數做為「單次性」抗爭事件，無論在點度中心性或中介中心性都位於前段者。一般來說，大型週期性抗爭事件的訴求常是長期的政治目標，或者包含較多訴求的政治理念。通常這類型的抗爭事件具有幾個特性：首先，為期較短，大部分是一天內的短期事件；其次，抗爭強度較低，大部分的活動是以事先申請的遊行方式進行，也較少採用激烈的政治手段表達訴求；最後，除了少數主辦者外，大部分的聲援團體多是淺層參與，鮮少參與事前的準備與行動的籌畫；而偶發性的單次抗爭事件則多指向特定的個案，參與的社運組織多已在相關領域耕耘許久，有較強的議題聚焦與參與深度，包括鍾鼎邦事件、大埔事件佔領內政部、全代會丟鞋事件等。太陽花運動作為偶發性事件，不只參與組織數眾多，亦相當程度居於事

16 此處參考審查人意見，將雙元網絡轉換成單元網絡進行計算。關於具體操作技術請參見附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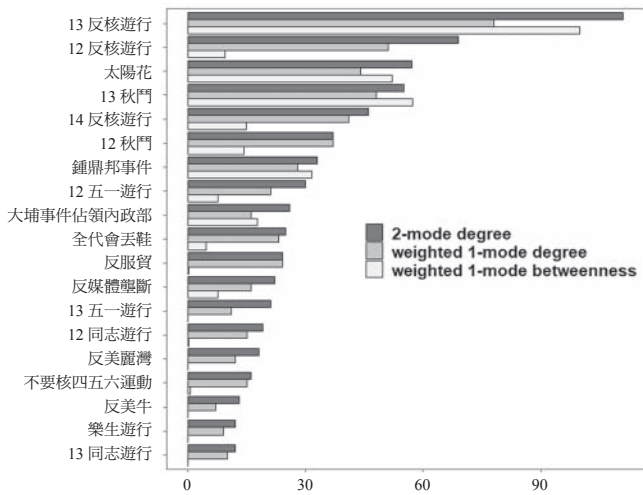


圖 1 抗爭事件之網絡指標

件網絡的中介位置，其參與組織卻又能連結不同端點的抗爭事件。此外，社運組織間於太陽花運動中的合作規模與深度，也是其他大型週期性事件所未曾經歷的。在第五節中，本文會再進一步論述組織者如何在密切的合作與協調中展現出社群文化。<sup>17</sup>

總體而言，社運組織間的大規模的政治行動重疊其實並非太陽花運動所獨有的現象，且深度的組織合作在過去也時有發生。但特別的是，太陽花運動的社運組織結盟，卻兼有以上兩種特徵。以下本文將以不同時段的組織抗爭參與網絡，分別簡述不同時期的抗爭參與網絡結構及其變遷。<sup>18</sup> 在社運組織抗爭參與網絡中，連結層面的結構關係所對應的是組織間的集體行動與集體參與。

### （一）鬆散連結期（約從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此一時期社運組織間的連結，相當依賴於大型「週期性」抗爭事件的集結。「鐘鼎邦事件」與「2012 反核遊行」扮演了串聯組織的

17 受訪者 A014、A015、A016、A017、A026、A027。

18 為了呈現上的精簡，以下的網絡圖沒有呈現無法通過組織連結到其他事件的「孤立事件」與其隨附的參與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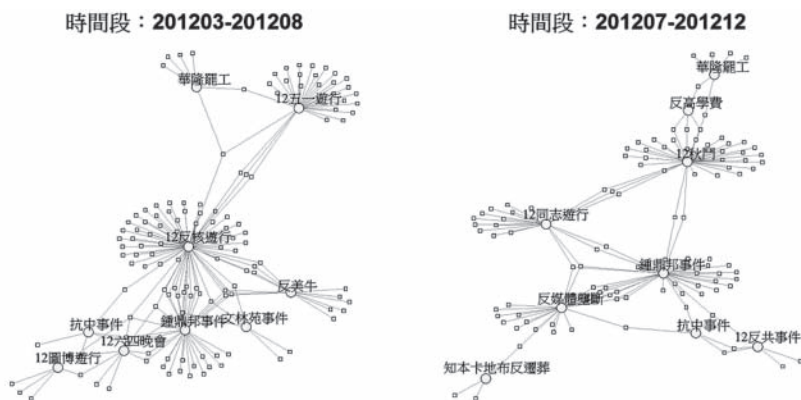


圖 2 鬆散連結期

重要角色，尤其是「反核遊行」的參與組織連接了與食安、土地正義相關的議題，如「反美牛」運動、「文林苑事件」，以及與中國議題相關的「抗中事件」、「六四晚會」。整體上此時期網絡的凝聚程度較低，跨組織的連結多呈現鬆散而脆弱的狀態。大型週期性抗爭事件直接左右了網絡的連結狀態，且跨議題的連帶多只由少數一、二個組織串起，整體跨議題的抗爭參與並不頻繁。

## （二）規模擴張期（約從 2013 年 1 月至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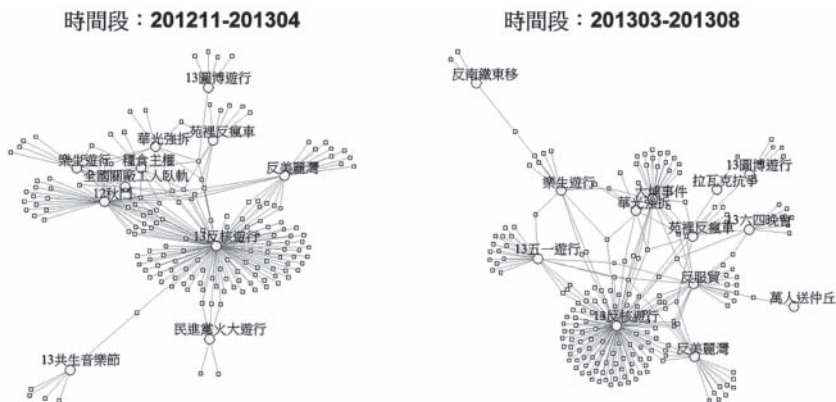


圖 3 規模擴張期



2013 年從 2 月的「糧食主權」、「全國關廠工人臥軌」，3 月的「華光強拆」、「樂生遊行」，再到 4 月的「苑裡反瘋車」與「反美麗灣」等事件。此段時間「環保」、「勞工」、「人權」、「土地」相關的單次性抗爭事件陸續爆發，在社會上引發相當的關注。此時有更多的社運組織投入到抗爭事件中。此外，跨議題的抗爭參與開始較為頻繁地出現。因此，即使沒有藉由大型週期性事件來串聯，多個抗爭事件間仍因數個不同組織的交叉參與，形成較為穩固的互動結構。多數「勞工」、「環保」與「土地」相關的抗爭事件間維持多個路徑的連結關係，說明此時期組織間彼此橫向接觸與合作的機會大幅度增加。

### （三）高度內聚期（約從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

如果說前一期的網絡凝聚仍多是週期性事件的串連，那麼在 2013 年末多個頗具規模的單次性抗爭事件，則更明確指向了對當時執政黨的不滿，如「反服貿」及「青年佔領凱道」。另外如「萬人送洪仲丘」、「公民升旗典禮」雖沒有大量社運組織參與其中，但卻吸引了大量的群眾參與者。在 2013 年中之後的這段時間（時間段：2013 年 6 月至 11 月），以社運組織的抗爭參與網絡規模來說，並不比前期來的更蓬勃。然而，這段時間卻匯聚更多異質的議題在其中，此波運動浪潮一直持續到 2014 年 3 月太陽花運動時才真正大規模爆發。此時期（時間段：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單就網絡的規模而言，雖未明顯大於前期，但是，更高比例的事件與組織在此時都被含括在一個更大的凝聚子群中。

為了進一步闡述社運組織合作的特性，本文援引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的概念描述社運組織社群的聯盟狀態。James Moody 與 Douglas R. White（2003）在討論社會凝聚時將之區分成兩個面向，其一是連結層面的結構關係；其二是認知層面的情感關係。多數時候社會關係的狀態與情感的依附兩者間是高度相關的。就連結層面來說，凝聚的結構關係所對應的便是社運組織間在行動上所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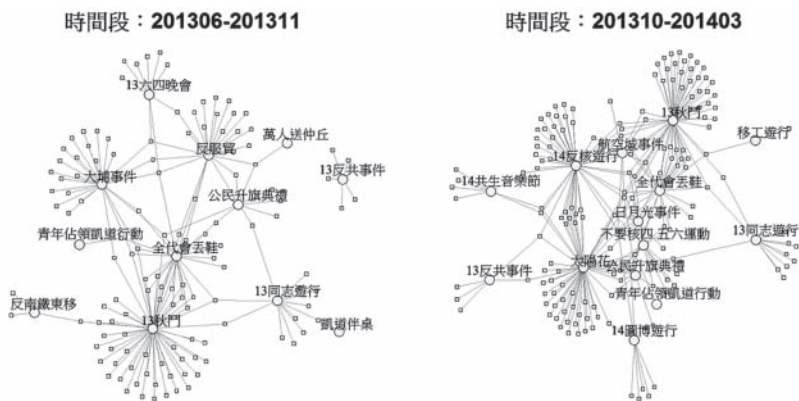


圖 4 高度內聚期

的「結盟」狀態。這個「結盟」狀態包含兩個核心的成份：結盟的「穩定」程度與結盟的「規模」大小，只有兩者都達到高點時才表示該社群的網絡連結狀態達到結構上的凝聚（structural cohesion）。這種結構上的凝聚狀態對應到社運組織網絡的意義，則是呼應前述提到的「跨運動結盟」，也就是組織在集體行動層面更加緊密的合作串聯。這種經時間累積的結盟程度增強，為社運團結奠定了基礎。至於認知層面的情感關係，也就是呼應集體行動所產生的集體認同，會在下一章節就田野訪談資料進行深入的論述，接著才會詮釋出社運團結的內涵。

在網絡研究中，結構上的凝聚通常指涉頂點間不容易被分裂、解離的「能力」。依此我們將雙組元（bicomponent）子群體定義為「凝聚子群」（Moody 2004; Moody and White 2003; Torrents and Ferraro 2015）。所謂的雙組元指的是次群體中的所有頂點間都存在著不只一條的路徑（path）（Moody and White 2003）。Moody 與 White 認為這樣的群體有較穩定的互動結構，不會因為缺少任一個頂點就使得群體分崩離析，在實證上，不同的商業與政治聯盟都能通過形成雙組元，構成更穩定的合作體系。有關雙組元的說明及示意圖請見附錄 1。在社運組織的網絡當中，當組織基於相似的判斷而做出

共同聲援的政治行動，亦是一種合作關係的擴大與鞏固。我們將各時段雙組元的規模與雙組元頂點佔所有頂點的比例（尺度為 0 到 100）繪製成圖形。圖 5 顯示，圈型為雙組元的規模，三角形則為雙組元頂點佔全部頂點的比例。對社運組織參與網絡的凝聚力來說，雖然三個時期的銜接中，分別在 2012 年末至 2013 年初與 2013 年中後至 2013 年末前有兩段短暫的反挫，不過，動態網絡中社運組織團結的逐漸成形、上升的態勢仍非常明顯，且雙組元的規模與比例也在 2014 年 3 月達到高點。此處希望凸顯的即是太陽花佔領行動之前，跨議題、跨組織的集體行動成形，形成了一個在網絡意義上更加穩定且內聚的型態，是社運團結的基礎。

總體來說，從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社運組織的抗爭參與網絡存在著明顯的趨勢性變化，這種變化是反映了社運組織政治行動的結構性變遷。在本文的資料中，「鬆散連結時期」的網絡普遍是以單一抗爭事件為核心的社運組織叢聚，加以少數的組織跨議題參與形成通路。如此的連結模式在接下來的兩個時期有著相當大的轉變。在「規模擴張期」，伴隨著整體網絡規模的擴大外，凝聚子群的規模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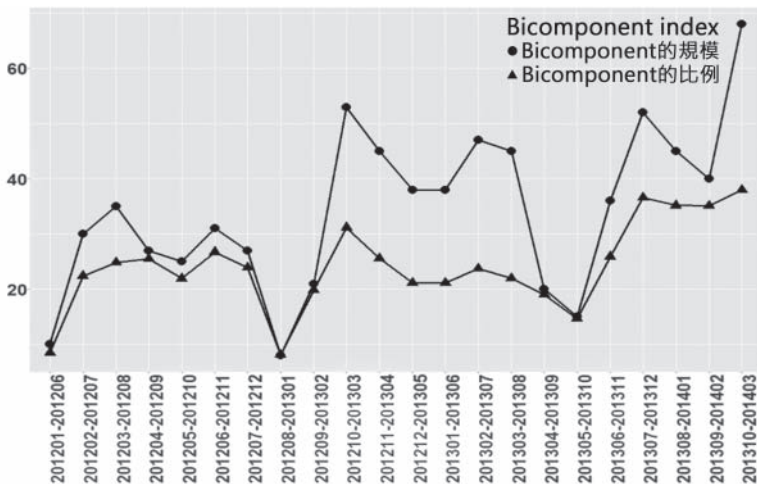


圖 5 各時期雙組元凝聚子群的規模與比例

隨之擴大，不過所佔比例仍低；接著，到了「高度內聚期」，雖然整體網絡的規模不再上升，但是，網絡內的凝聚子群卻高度擴張，涵蓋了更多的社運組織進入其中，總共約有 40% 的頂點進入高度內聚的凝聚子群中。至此，可以見到社運組織在這段期間，形成了一股邊界在擴張，並具有逐漸穩定橫向連結的社群，且已經不僅僅侷限於單一抗爭事件或單一性質的運動中。網絡當中凝聚子群在 2014 年 3 月的太陽花佔領行動達到最高峰，已經看見了促成團結最重要的爆發點，但還無法看出其中的行動者透過什麼樣的機制凝聚彼此。下文的田野資料將證實行動者在這段期間相互聲援與結盟，是以價值為導向的集體行動。在下節中，本文將進一步以訪談資料為基礎，呈現出這些社運組織的行動者們在佔領期間所展現的能動性（agency），並說明社運組織社群所達成「社運團結」內涵為何。

## 五、以社運組織與幹部為軸線的佔領敘事

社會運動的「團結」是特定歷史時刻中的產物。「社運團結」奠基在跨運動結盟經驗所帶來的信任關係之上。前一節社運行動網絡分析已經指出：社運團體透過參與跨組織動員而有所連結，隨著議題的性質和抗爭方式而有不同的結盟型態，描繪出社運團體在太陽花佔領行動前粗略的政治行動樣貌。本節則聚焦在太陽花佔領行動期間具有一組強連結的運動次群體，也就是活躍於佔領行動且皆加盟「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核心社運組織。如我們的訪談調查顯示，這些社運團體的重要幹部，都具有強烈的參與公共生活的傾向，而且彼此之間在過去多年間漸漸具有較為綿密的社團網絡的互動與互信。理論上，在連結性較強的社群之中，社運網絡所提供的「團結誘因」（solidary incentive），<sup>19</sup> 可能使得參與者傾向認同行動參與本身就是

---

19 這裏的原文“solidary incentive”乃是根據 McAdam (1982: 45) 提出的“Established Structure of Solidary Incentives”。

報酬（何明修 2005: 54）。在此類集體行動者的心理結構中，「參與公共事務本身即是一種利益（good）」（Hirschman 1982: 90），而無需獲得所謂「選擇性誘因」來克服「搭便車難題」。我們在訪談中也發現，這些熱情的社運幹部在「投入」（involvement）時刻，大都置身在一種義無反顧的倫理情感狀態，「不能放著不管」，甚至是處於放下手邊例行工作立即投入行動的「召喚」或「渴求」狀態，正如同 Hirschman（1982: 91）所形容：「在這種時候選擇搭便車，就等於拒絕一頓美食」。本節將具體分析，在太陽花運動中連結性較強的社運組織中，這些社運幹部如何在關鍵時刻克制各自內心的糾結或掙扎，接受高強度與高難度集體行動的召喚，進一步增強彼此的合作關係而達成團結狀態。

上文已經談到團結的概念與集體認同高度重疊，Hunt and Benford（2004: 439）將團結描述為「行動者認知他人、且被認知屬於同一個社會單位的能力」，且說明團結有兩個基本核心：內部和外部。內部是集中在一個人所屬的團體及其及團體成員，外部是對不屬於某個團體的識別。在社運團結的展現中，團體之間經由差異、競爭衝突與溝通，達成組織成員之間集體身分的互相肯認（mutual recognition）。衝突作為非意圖結果，反而強化了這群社運組織的內聚力，也強化了佔領期間社運組織之間對「社群共同體」的認同，並影響了運動的發展和成果。關於這個「社群共同體」認同，一位社運組織工作者回想佔領剛發生時，自己和熟識的夥伴之間採取的行動：

（三一八當晚）我去了之後在青島東街第一個門，超痛，那天局勢很緊張，其實 NGO 捲進去是因為三一八，我忘記哪個團體主揪，就問我們團體有沒有想一下討論後面怎麼做，討論如何因應局勢之外，在我們 NGO 討論很重要，那麼多人都衝進去了，那麼多聲援的人，不能放著不管，那時候就講說一個運動要成功要內外施壓。……青島的人是留著住了，反而濟南這邊空掉，那時候就在討論這些人怎麼

辦，那時候四個 NGO 吧，反正就四個團體，很可憐，一天二十四小時要控台（控制舞台和現場）。<sup>20</sup>

太陽花佔領期間從第一天開始，幾個在現場相遇的社運組織工作者共同決定要各自分工去控制議場外的狀況，便開始肩負在外場青島東路、濟南路長期輪班的工作。這項任務不只展現了社群內部高度效率的分工動員，<sup>21</sup> 也展現了社運組織在混亂現場能夠即時做出適當的「政治決斷」，肩負起留住外場群眾，達成「內外施壓」的任務，讓現場穩定下來。同時，他們也強調當媒體與群眾將目光放在議場時，這是大多數人第一時間沒有注意到的工作。<sup>22</sup>

社運組織工作者於不同情境的「主——客」敘事框架，證實了集體認同的存在。當社運組織工作者談及「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例行運作時，通常以其所屬的組織名稱作為自述的主體；但是在描述佔領期間的狀態時，則轉而以「我們 NGO」來回應，<sup>23</sup> 並與「議場學生」做出區隔。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形成屬於社運組織的集體認同，並不表示社運組織將這些指認為「他群」的學生／青年行動者視為對立的對象。社運組織工作者在佔領結束後的訪談，也曾提到在合作過程中從學生身上有學習到不同的運動模式跟技巧。<sup>24</sup> 另外，青年行動者也分成了許多次群體，包含了許多「素人」（意即過去缺乏社會運動參與經驗者）以及曾活躍於學生運動的行動者，甚至也有年齡相距更多的「非青年」。為了行文簡潔，將不再特別標示出「學生」一詞帶有的多元異質性。

即便社運組織工作者間所描述「我們 NGO」的意義，不見得對

---

20 受訪者 A014。重點為作者所加。

21 受訪者 A026。

22 受訪者 A014 表示：「那時候就講說一個運動要成功要內外施壓，維持一定人數給予壓力。」

23 需要特別說明是，「NGO」一詞字面意義上是指非政府組織，但台灣社會運動組織（SMO）的社群，皆習慣以「NGO」這個詞來自稱他們所屬的群體，因此本文以受訪者所使用的詞彙來表達其主體稱謂。

24 受訪者 A056。



於所有人都相同，<sup>25</sup> 卻已顯示他們在佔領期間對集體的邊界做出明確的判斷，也就是與學生有所區隔。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召集人賴中強便曾公開呼籲應將佔領行動稱為「公民運動」而非「學生運動」，強調社運組織的付出及分工的重要性。<sup>26</sup> 同時，也有人提到佔領的過程讓彼此的「關係變好」，有情感凝聚的成分在其中：

我覺得 NGO 內部是蠻團結的，就是有點被學生排擠啊、被媒體排擠啊，大家也覺得要成就這場運動，願意多犧牲自己角色。我覺得現在跟大部分 NGO 夥伴蠻好的，其實是因為三一八的過程。<sup>27</sup>

社運組織工作者也提到大家的共識是「以議場為主」，不要去對外「搶發言權」，<sup>28</sup> 體現社運組織在過往抗爭經驗中所培養的「默契」或「規矩」。縱然如此，許多來到現場聲援、靜坐的群眾仍會認為整場運動應該讓「學生」主導，而因此與社運組織工作者爆發衝突，讓社運組織成員倍感委屈。<sup>29</sup> 有部分社運組織工作者甚至認為「學生」太過重視自己的想法，無法聚焦於整體運動策略和分工的討論中。<sup>30</sup> 相對的，在一些議場學生的說法中，則會認為社運組織是以一種「家父長心態」在「保護學生」，反而讓整體運動的策略保守化。<sup>31</sup>

「學生 vs. NGO」分群的另一項具體例證即是佔領期間的「NGO 會議」。由於聯席會議被定位為討論對外政策和議場事務，社運組

---

25 根據訪談前後文提到的議題及行動，這個「社群」的範圍有時是指稱共同合作的組織，甚至包含長期參與社會運動的個別積極行動者和學生；有時則是指雖然沒有直接合作，但能夠知曉彼此目標一樣，做事方法不同的組織們。

26 2015 年 3 月華人民主書院台港交流論壇筆記。

27 受訪者 A015。

28 受訪者 A014。

29 受訪者 A017。

30 受訪者 A015：「我其實主觀一點講，學生能不能放下自己多一點點，因為這就不是一場學生運動，（能不能）把局面看大一些些。」

31 受訪者 A002。

織之間的分工輪值就被要求另開會議處理。<sup>32</sup> 卻也因為如此，社運組織在佔領行動中有一塊屬於他們溝通、互動的場域。<sup>33</sup> 也就是說，主觀上受到部分學生及媒體的排擠，客觀上與學生工作任務的區隔已成形，再加上過往合作所形成的集體認同與情感聯繫，讓「學生 vs. NGO」成為這場佔領行動中有意義的人群分類。

### （一）結盟過程的文化形塑

一般來說，社運組織內部長期運作之後都出現較為明顯的科層體系。組織工作者對內多有明確的身分職責及不同層級的邊界，也有各自的決策體系和分工架構，並通常以「會議」作為決策場域。有社運組織成員便提到，即使在佔領的混亂時刻，也要在街頭現場開「執委會」來決定重大事項。特別是以組織資源聘用的秘書處成員，需要經決策程序確認後，才能放下原先組織內的工作，支援現場佔領工作。<sup>34</sup> 以「組織」身分參與運動，也意謂著成員一旦對外參與會議、公開發表言論時，必須以組織立場做表態和行為，否則就必須特別聲明自己「不代表組織」，也就是說，社運幹部在佔領運動中是以組織邏輯來行動。會議中的發言，會在事前於組織內沙盤推演，決定「授權」組織代表在會議中決策的範圍。當會議結束後，也必須將內容回報到組織內部。社運組織成員就曾提及「學生」並沒有這種做事習慣：

（三一八佔領行動期間）NGO 的誰去開會始終代表團體，但議場不是，議場連我們今天來的人是誰，他是代表誰，他是誰我都不知道。他今天在這裡講的事情，明天會推翻。我

---

32 受訪者 A014：「有一次聯席會議說時間很有限，所以這裡只要討論對外政策和議場內，NGO 的事情你們自己喬，所以我們又開一個外掛 NGO 的會議。一個運動怎麼可能區隔這是 NGO 的事、這是學生的事、這是議場的事？」

33 受訪者 A026：「那時候幾乎天天見面」。

34 受訪者 A027：「後來我們就有因為整個辦公室的人都沒有在進辦公室，就全部都待在現場，就有臨時開會，跟執委開的會，就決議全力支持現場事情。」

覺得 NGO 很有耐心，每天都在適應新的人，然後重新講一遍，然後等大家吵架。<sup>35</sup>

在跨組織的會議或行動時，各團體會盡量固定其出席代表，以免會議進行時因為資訊落差降低溝通效率。這是存在於各社運組織內部的「默契」，因此，面對學生組織以及議場佔領工作小組的會議組別一再更換，並因此造成資訊落差和衝突時，社運組織工作者就顯得無所適從。整體而言，這樣的現象除了反映社運組織與議場學生間，對當時的抗爭狀態與抗爭期間的「工作模式」存在認知上的鴻溝外，「更換組織／工作小組代表」所造成的摩擦，也反映著社運組織工作者自成一個社群以及與年輕行動者的疏離，無法辨認學生代表在其所屬組織的位置與代表性，進而對學生代表的說法失去信任。

除了太陽花佔領行動之外，社運組織會考慮自身能量以及該議題與組織核心關懷的相關性，去衡量投入抗爭行動的深度，且組織間是有默契地相互「補位」。<sup>36</sup> 不僅如此，如果判定自己所屬組織對特定行動投入不夠深，那麼，即便對該行動的行動風格或背後的議題立場不全然認同，也不會在外公開發言時對該行動做出過多評價。同樣的，當社運組織聲援其他組織的行動時，則會盡量讓主軸聚焦在主辦的團體身上，避免過於高調，搶走群眾或媒體的關注。<sup>37</sup> 這些細微的互動規則與行動默契，展現了社運組織厚植於運動場域內豐富的合作經驗。這樣的默契不僅止於組織間直接在抗爭場域的合作，<sup>38</sup> 更多是透過社運組織網絡之間日常互動的機會而形成更普遍的社群文化。這種互助、補位的文化，在佔領過程當中也被彰顯。當佔領行動發生

35 受訪者 A014。

36 受訪者 A017：「NGO 比較屬於默契，台灣 NGO 有些有趣的互相補位的情形，在各個議題上，勞工部分、人權部分、環保部份，其實彼此之間都會比較選擇尊重跟相信彼此之間的論述，互相支援，那種默契不用花太多力氣。……那種補位是有點心照不宣，一個眼神就知道在那個位置，你說那怎麼形成的，就是長年累積的結果。」

37 受訪者 A040。

38 如本文在第四節所述，組織間很少有著能串連著所有其他頂點的活躍組織，而且，絕大部分的組織只有 1、2 個抗爭參與的經驗。

時，核心的社運組織就主動以過去行動串聯的平台徵求支援：

我們是公開在環保團體的群組裡面要求說我們 24 小時都需要有人輪班。每天三班還是四班制，需要大量的主持人請大家來支援，所以很多團體都跳出來支援。<sup>39</sup>

從受訪者的證詞當中，也指出這些很多「跳進來支援」的團體，不一定參與和決策相關的會議，也不一定會在街頭現場凸顯自己的組織名稱，甚至有團體謹慎地避免在現場輪值時募集自己組織的資源，而是將資源全數歸於反服貿運動。<sup>40</sup> 從組織文化以及跨組織共享的倫理與默契，更清楚描繪了「社運組織社群」的內涵。佔領過程中，相對於利益結合，更多地是來自過去合作經驗所培養的社群文化，以及現場互助分工的情感元素。此一共同體的維繫，來自於對彼此在議題耕耘上的尊重，以及各自組織狀態的理解與信任關係。因此，即便不同團體在價值及行事風格上依舊存在著些微的分歧，尚無法稱做一個緊密的組織型態。但社群內的成員，依舊能藉著幽微的價值連帶與互動默契，並展開各式互動與策略結盟，在高張力互動的佔領現場便是如此更加強化了內部的凝聚。

## （二）太陽花佔領前的行動基礎

社運組織在太陽花佔領行動期間的合作展現出巨大的成果，其實是一種過往「集體行動」的再現。從前一節的社會網絡分析當中，可以看見隨著時間愈趨近太陽花佔領行動，跨組織的結盟與網絡內部凝聚性也隨之增強。社運組織在各自的議題中經常以國會遊說、陳情、記者會、街頭抗議、衝撞、遊行等各種方式進行倡議，這些抗議形式本身就包含在他們平時的工作內容當中。意即社運組織原先就具備了

---

39 參考審查人意見，補充社運組織之間互助聲援等情感元素展現。受訪者 A057。

40 受訪者 A041。

獨立執行示威抗議的能力。本文多位受訪者也提到太陽花爆發的前幾年，不同的社運組織頻繁策劃行動，經常走上街頭開記者會、抗議；校園異議性社團開始增加，學生行動者也經常出面聲援各項議題；抗議的等級也從本來常見的記者會、遊行升級到夜宿、佔領：<sup>41</sup>

在太陽花佔領行動以前那幾年，做運動的人都有個感受是衝街頭的頻率很高，13 年還在開玩笑是每週上街，因為有議題 NGO 一直上街，然後到三一八，從每週動員到住在這邊了。<sup>42</sup>

太陽花佔領行動爆發前一年，同樣以佔領公部門建物形式的「八一八拆政府」行動經常被拿出來比較。起因於苗栗大埔張藥房的強拆案，台灣農村陣線發動佔領內政部行動，雖然僅佔領一個晚上就撤走，卻對許多行動者留下深刻影響，而被認為具有「實驗」、「練習」的性質，讓後來佔領立法院的行動得以成功。不少受訪者也提到 2012、2013 年許多土地相關的反迫遷運動，經常以較激烈的抗爭手段來阻擋政府執行建物拆除，為許多積極的社運行動者們奠定拉高抗爭層級的基礎：<sup>43</sup>

其實從三一八前一年，一直有人在喊佔領國會的這種訴求跟口號，但可能還沒有什麼人在真的當一回事。……佔領內政部，但也是一個晚上，隔天早上大家要上班就大概就走了，就那次有點是實驗性質，就好像在練習。<sup>44</sup>

除了佔領形式的抗爭之外，每年例行舉辦的大遊行則是跨組織

---

41 受訪者 A027。

42 受訪者 A014。

43 受訪者 A020。

44 受訪者 A027。

聯繫與結盟的穩定操練。反核議題得益於其獨特的歷史脈絡，讓除了環保團體以外各領域的社運組織也相繼加入。之後更在 2013 年組成「全國廢核行動平台」，於北、中、南、東各區都有幾個核心社運組織認領秘書處工作，使得各組織於遊行之外也維持一定的結盟和聯繫。反核遊行的重要性，在前文的網絡中心性測量中也明確顯示。社運組織在反核遊行的協力經驗讓不同組織的工作者培養出信任基礎，議場外青島東路的活動安排也部分沿用了反核遊行的聯繫管道。<sup>45</sup> 由於反核遊行組織數量與舉辦活動規模相當龐大，社群內部的不同社運組織需要面臨許多傳遞資訊、相互溝通等瑣碎繁雜的工作；對同時參與在廢核平台的核心運作者而言，太陽花佔領期間的「三三〇遊行」某種程度上就是「反核遊行」籌備模式的重新運作：

三三〇（遊行）是因為反核已經比較有默契，因為那時候是  
愔欣、中岳跟我們這邊就比較用反核遊行的模式在操作，因  
為我們之前遊行的分工大家比較有默契。<sup>46</sup>

由於三月初甫結束的廢核遊行也是大規模的活動型態，廢核平台的聯盟形式匯集了眾多組織力量，得以協調和整合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源。「三三〇遊行」從細部議程規劃、舞台設備、主持、街頭宣講和動線的安排，都是在「NGO 會議」中討論和準備，才帶到聯席會議做確認。<sup>47</sup> 這場遊行的取得相當受矚目的成就，讓當時媒體質疑學生無法自己搭建出當天的設備規模，便「盛傳三三〇是民進黨辦的，因為他們（指學生）有辦法調到那麼多物資、資源……一定是民進黨在出手。」這種媒體的誤解，反倒讓負責「三三〇遊行」的主要組織者之一為這場行動引以為豪。<sup>48</sup> 社運組織在佔領期間以一個群體的形式

---

45 受訪者 A057。

46 受訪者 A027。

47 受訪者 A027。

48 受訪者 A015。



共事互動，是奠定於先前行動的基礎，這樣的認知也被社群成員所認同：

你知道這些人搞過什麼啊，你知道這些人大概是誰啊，你也有看到很多熟的朋友在裡面嘛。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運動社群，這個運動社群的網絡跟其他的社群一樣，是需要基礎建設、是需要基本的信任跟彼此的一些經驗，或遠或近，所以我認為過去這些比較大的社會運動的確是有造成三一八（佔領行動），有增加三一八（佔領行動）這種事情發生的機會。<sup>49</sup>

「佔領內政部」行動跟「反核遊行」的運作，只是太陽花佔領行動爆發以前其中兩個跨議題合作的操練案例。重要的是，組織間透過互相聲援行動、對個別議題做立場表態，孕育組織之間資源共享及互助的文化，讓僅有的資源做最有效的利用。同時，社運組織間跨議題的結盟，從各種領域的視角去回應社會重大矛盾的議題，期望藉由彰顯社群的力量，做為未來倡議與談判時可用的政治籌碼。因此，組織之間對彼此合作產生的社群更加具有共鳴。對照網絡分析的結果，映證太陽花佔領爆發以前幾項大型抗爭的連結與趨向凝聚的情勢，對佔領期間的合作是具有正面影響的，組織之間是出自於對整體情勢的判斷而做出集體的政治行動。佔領期間，由於清楚劃分出「學生」與其他相異的群體，而更加催化了社運組織內部的凝聚力。社運組織能夠在太陽花佔領期間展現出高效率、高默契的合作，乃至於生成了更高程度的集體認同意識和情感連帶，是奠基在佔領以前的結盟基礎，而不只是因為與其他次群體（如學生）的衝突才產生。<sup>50</sup>

---

49 受訪者 A016。

50 回應審查人意見，社運組織之間的集體認同並不只是因為佔領期間被學生排擠形成，而是在過去的倡議與抗爭行動中便開始累積。

### （三）「民主」與「抗中」互為表裡：構框與結盟擴大

Tarrow (2011) 將社運團結視為「集體認同、情感、構框」三者的交集，以上分析較著重集體認同及情感連結面向，但構框也在佔領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反服貿」議題發展本身也豐富了運動不同層次的訴求，包括從馬政府上台後不少議題都被認為與「中國因素」相關，加上經濟低迷下「服貿」對產業和就業市場衝擊的疑慮、對於「自由貿易」的反思，以及被認為是「黑箱」的粗暴程序，點燃了行動火花。從太陽花運動中的核心社運組織來看，即便其組織的主要議題與服貿沒有直接關係，也會在公開發言或新聞稿中以「民主」這個角度切入，從而正當化組織性資源的投入。以下分別引用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地球公民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及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的公開聲明：

這是為什麼綠盟支持並盡力聲援佔領國會行動的重要理由：  
當體制成為當權者順手的壓迫工具時，我們除了試圖癱瘓這個壓迫，奪回我們應有的政治權力，我們還有什麼選擇？<sup>51</sup>

地球公民所關切的工業污染、山林水土的保護，乃至反核運動等，無不涉及國家的產業經濟政策，以及背後的政治角力或分贓；而各種公民運動的過程，不斷要求政府要落實公民參與、資訊公開，更是深化台灣民主的重要工作，因為我們深知，只有落實民主，才能確保環境不會在黑箱作業中，被財團和政客出賣。<sup>52</sup>

以婦女新知長期關注的照顧工作為例，具體說明貿然開放可

---

51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奪回選擇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支持並參與佔領國會行動聲明」，2014年3月29日（<http://www.gcaa.org.tw/post.php?aid=400>，取用日期：2018年1月3日）。

52 地球公民基金會，「地球公民參與『反服貿行動』的角色及訴求」，2014年6月14日（<https://www.cet-taiwan.org/node/1954>，取用日期：2018年1月3日）。

能造成女性權益的實質損害，反對民主與性別雙盲的黑箱服貿。……我們要實實在在的性別影響評估，不要私相授受的兩岸協議；我們要的是公民參與和國會審議。沒有民主，就沒有性別平等。<sup>53</sup>

兩岸服貿協議現今在朝野對立的結構下已然變成反中與否的對峙，但對於基層勞動者而言，真正的議題不在於反不反中，而是人民生計的問題。……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站在弱勢勞動者的立場，堅決反對貪婪無止境的資方陽謀，同時反對與資方沆瀣一氣，為資方之利，輕易踐踏民主、欺壓勞動者的國民黨政府。<sup>54</sup>

必須特別說明的是，以上的分析文本都來自於社運組織公開在網路上的聲明，由於本研究特別強調組織之間的結盟關係，因此以組織性的公開發言作為主要分析來源，以此表述這場運動檯面上的主要構框。社運組織幹部在受訪時，也會傾向以組織代表的身分，發表組織內部集體共同的立場，以此作為個人參與佔領運動的理由。因為參與佔領行動本身，對社運組織幹部而言是職責的一部分。然而，參與佔領行動對涉入其中甚深的行動者個人而言，可能具有更豐富的意義，行動者內部深層動力的挖掘，需要從更多「非公開文本」當中著手進行分析。由於本研究聚焦在組織層次的合作關係，此處的分析以組織的正式公開文本為主。

不同專業議題的組織，需要各自找到她／他們關心的議題——例如環境生態、性別、工運等——與反服貿協議的連接點。「民主」就是他們在公開文本中所表明的關鍵連接點。我們發現，對「民主」構

53 婦女新知基金會，「占領國會運動，性別觀點不缺席」，2014年5月5日（<https://www.awakening.org.tw/topic/2329>，取用日期：2018年1月3日）。

54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反服貿聲明」，2014年3月18日（<https://www.facebook.com/ShutDownButNotShutUp/posts/629364100474058>，取用日期：2018年1月3日）。

框的使用，從 2013 年夏天啟動的反服貿運動的初始便存在，而在佔領爆發之後更用力凸顯。<sup>55</sup> 意即在整體反服貿運動的張力變化過程當中，也是有框架擴張（frame amplification）的現象產生。在訴求中強調「民主」的同時，也同時對照出，簽署貿易協定的「中國」是一個「不民主」的政體。這個主要構框不僅使得原本同屬一個網絡內的社運組織更加凝聚，也拉進了原本不在此一圈子中親近網絡內的社運組織，更擴大了團結的組織範疇。

然而，儘管這幾個在佔領行動中擔任核心組織工作的團體領導人或幹部，都聚集在「民主」問題，而這些引文中都沒有提到「中國」，但關於「中國」與「中國因素」的思考，並未在這場規模龐大的動員中缺席。剛好相反，我們的訪談顯示，不少參與太陽花運動的團體成員都提到了對中國影響力滲透台灣民主的憂慮，並認為「中國因素」是發動大規模動員的一個重要因素，畢竟國民黨政府簽署服貿協議的對象是中國政府（中共政權），因此，抗爭的對象既是馬英九政府也是中國政府。（但我們也不據之推論，所有的參與團體或大部分團體都具有這樣的思考。）再者，如同前引徐斯儉（Hsu 2017）、吳介民與廖美（2016）、何明修（Ho 2019）、與吳介民（Wu 2019）等人的著作，中國因素在動員過程扮演其中一個關鍵作用；而且從台灣與香港的對照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正因為是台灣的抗爭者大部分對中國作為抗爭對手有一定的共識，而當時香港政治認同則尚處於被壓抑或不確定的狀態，而使得兩地在抗爭對手的指稱上有重大差異（吳介民 2014）；甚至是在面對中國立場差異上，使運動內部出現明顯分裂（Ho 2019）。

因此，仔細深入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詮釋：「**守護台灣民主**」與「**抵抗中國影響力**」是互為表裡的主框架。強調民主，可以擴大結盟對象；而強調中國因素，則可以鞏固結盟圈中的獨派團體與抗中力

---

55 參考上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婦女新知基金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全國關廠工人連線等社運組織的公開聲明。

量，例如台教會這一類長期關心台中關係的組織。「服貿協議」爭議所牽涉的中國議題，是倡議台灣獨立的社運組織（以下簡稱「獨派組織」）所關懷的議題。在太陽花運動發生以前的十幾年當中，一般關心社會上各面向議題的社運組織，與獨派組織之間有著明確的區隔，合作與互動的場合也較少。<sup>56</sup> 然而，由於太陽花運動爆發之前，有幾波與中國因素相關的抗爭，即有獨派組織意識到與一般社運組織串連的重要性，因此想要加強和社運組織合作，並認為許多社運組織只是「沒有公開講台獨，但他對台灣的想像其實是一樣的，不應該因為他沒有公開喊台獨，就不願意跟他合作」。<sup>57</sup>

在反服貿運動初期，被歸類為獨派組織的「台灣教授協會」（以下稱「台教會」）原本要獨自舉辦抗爭活動，但在活動之前得知賴中強律師將串連社運組織組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以下稱「民陣」）並舉辦晚會，便在活動前安排認識彼此的場合並溝通運動訴求。台教會當時的訴求較為激進，希望直接就是將服貿「退回中國」，而民陣作為社運組織的聯盟，認為策略上應該以程序性訴求「逐條審查」為優先。雙方大方向的訴求一致，只是運動訴求上有些微歧異。當時，具有整合意識的台教會組織者，擔心外界因此產生不同團體之間打對台的印象，便決定配合整體聯盟的運動訴求，加入民陣。<sup>58</sup> 民陣作為串連公民社會組織的樞紐，在擴大結盟的過程中，提供了公民社會空間作為集體行動的平台，而扮演起構框「公民社會」的樞紐角色，從本文對構框理論詮釋角度，民陣提供了公民社會作為集體行動框架，而使得「民主／抗中」這個主框架得以「動起來」。<sup>59</sup>

再者，與反服貿運動同樣於 2013 年起始的，有一個以網路自發性動員為主的大型集體行動，起因於洪仲丘事件所爆發的「白衫軍運

56 受訪者 A031。

57 受訪者 A040。

58 受訪者 A040。

59 「民主」是社運組織公開聲明當中常見的論述。「抗中」則較接近潛台詞，是從中國因素造成台灣民主的威脅去談論對中國影響力的抵抗。

動」。其中最大規模動員的行動在八月三日，超過十萬人的集會「萬人送仲丘」。這場行動後來的調性也從洪仲丘事件拓展到其他更廣泛的公民議題上。當時這場行動所建立的「公民 1985 行動聯盟」（以下簡稱「1985」）的幹部表示，由於行動訴求被接受，就期望大家將關注公共議題的能量轉介到其他議題的關注上，包括納入反服貿中的反程序黑箱，使得「反對少數政治菁英把持服貿決策」成為這波公民運動的內涵的一部份：

那天很幸運活動到一半行政院就說訴求都接受。所以那天演講我趕快變更內容，我說不要忘記洪仲丘，還有大埔阿嬤、反核的人，這些都是相關的，那時公投盟的人還在立法院坐，我希望透過這件事情連結，關心不能只有這樣子，那時候也想到服貿，這麼大的公務體系但（卻由）這麼少人做決定。<sup>60</sup>

「1985」幹部強調在這場行動之後，關心的議題範疇已經擴大，從洪仲丘事件的軍中人權議題，到土地徵收、環保，甚至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反服貿議題**。<sup>61</sup> 該幹部也表示他原先與其他社運組織的人彼此互相不認識，是在「萬人送仲丘」之後，才主動接觸了其他社運組織的幹部，並認識更多社運組織。接下來十月份的活動，就受到其他組織訴求的影響，改以「公民護憲還權於民，黑箱服貿重啟談判」為主要標語，同樣成功動員上萬人參與。<sup>62</sup> 與台教會不同，「1985」一開始並不在民陣的聯盟名單當中，而是在 2013 年 12 月下旬民陣發起「反黑箱服貿週」這波行動後才加入。<sup>63</sup> 在太陽花佔領行動爆發後，

---

60 受訪者 A033。重點為作者所加。

61 徐斯儉認為「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對於反服貿的態度是「從潛在質疑到公開反對」（Hsu 2017: 147），但本文的受訪資料顯示，早在「萬人送仲丘」的集會當中組織者便有意識將運動所關心的議題範圍，擴充至反服貿這種政治性的議題。

62 自由時報，「白衫軍占領自由廣場 嗆政府還權於民」，2013 年 10 月 10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882160>，取用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63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回顧：從反黑箱服貿到經濟民主連合」，2014 年 12 月 9 日



曾經因為團體之間的信任不足而產生磨擦，「1985」成員與其他社運組織、學生組織幹部，對議場外醫療通道的設置及糾察隊的設置和輪替有不同的意見。<sup>64</sup>對此，「1985」的組織者當時採取的是安撫內部成員的作法，希望大家能夠為了運動互相忍耐，因此並未導致嚴重的分裂。

「守護民主」作為運動動員之檯面論述上主框架的一個元素，而能夠容納台獨意識與主權論者的需求，是反服貿運動至佔領行動中不同次群體能夠整合運作的一個關鍵。台教會和「1985」都是在反服貿運動之後才開始與原先民陣內既有網絡的核心組織們開始緊密合作。當我們訪談民陣內部原先的核心組織：「是否有從反服貿運動之後，才比較有合作關係的組織？」有被提及的主要也是台教會和「1985」。這兩個組織也在太陽花佔領行動時被列在前述「NGO 會議」的聯絡名單當中。同時，他們在運動中也是相互的調整彼此的做事風格，因此能夠在高張力的狀態當中協調合作關係。因此，本文所界定的「團結」的意義，除了既有網絡內組織的緊密凝聚之外，也帶有擴大範疇的包容性。從反服貿運動的構框本身帶有不同訴求層次切入，包括「中國因素」、「反黑箱」作為當時民意較高度支持的內涵，而能夠容納獨派組織和以公民意識為主訴求的新興網路組織。無論台教會或「1985」，都是其內部組織者或重要幹部有意識地希望與其他團體採取合作關係，甚至在運動過程當中妥協自身原有的決定，這些政治判斷也彰顯了團結的價值。「民主／反黑箱」議題框架整合了以往關於台灣認同或統獨意識形態不同調性的社運組織，尤其是獨派團體對於「抗中」與「中國因素」的強調。就此而言，太陽花運動之框架擴張的作用相當明顯，它至少整合了民主防衛、社會認同（階級與性別等議題）、與中國因素等原先分屬不同抗爭議題領域的組織，而同時擴大了認同的範圍與深度。這個框架涵容了更多組織的過

---

（<https://dfactsa.wordpress.com/2014/12/09/> 回顧：從反黑箱服貿到經濟民主連合 /，取用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64 受訪者 A033。

程，是從過去幾年內的社會運動與抗爭當中逐漸萌芽醞釀而成型，直到佔領爆發時才能夠作為促成團結的條件。這也正與前文所呈現網絡凝聚子群的狀態相互照映。

#### （四）面對危機而未潰散的凝聚能力

本文所關懷的「社運組織社群」並不宣稱納入所有在研究時間段中的社運組織。聚焦到太陽花佔領期間，凝聚力最強的是「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的核心成員組織。他們有合作參與抗爭的經驗，共享近似的運動價值規範，在佔領期間一起參與開會、分工和決策。除此之外，還有不在民陣團體名單之內，但也輪值於議場外青島東路及濟南路及相關工作的團體，會參與邊界更為廣泛的「NGO 會議」並加入排班輪值。有些團體甚至不一定列在會議名單，卻也投入一定人力資源以支應現場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主持、短講和影片與談等相關工作。這些組織雖然不屬於「核心團體」，卻為運動的穩定進展貢獻了相當的成果。此外，有些社運組織既不參與民陣，也未納入「NGO 會議」的運作，但仍以某種形式「參與」在太陽花佔領行動現場。<sup>65</sup>

佔領期間，行動者們經常以「相忍為運動」一詞自嘲（亦有人使用「相忍為國」一詞），<sup>66</sup> 意思是雖然對於運動中的決策體系不滿，或是次群體之間合作中產生摩擦及火花，但是為了守護、促成這場運動更大的成果，作為行動者可以選擇忍耐這些負面經驗。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句話的使用並不僅止於社運組織的成員，青年、學生群體也會使用，在庶務工作中擔任一定職位的中層幹部也會使用。即便是具有衝突的次群體雙方都有一定共識地認為，就是要維持住民眾佔領

65 編委會提問：「如何解釋這些『沒有社運團結』但是卻參與太陽花運動中的 NGO（例如「賤民解放區」）？」「賤民解放區」在運動期間以批判姿態採取獨立行動。《賤民解放區 2014-2015：318 佔領運動以及其後》一書提到：他們一開始即不想破壞運動，因此採取較為溫和的方式進行議題對話，直到 4 月 7 日之後才提出要與「主場」明確做出區隔（頁 62）；即使如此，也未做出真正破壞佔領運動的行為；該書也提到「所謂的三一八學運，早就是一個全民動員的運動」（頁 68）。本文並不宣稱這些團體包含在太陽花運動的「社運團結」範疇。然而，即使不認同甚至反對這場運動的主框架，他們並未成為運動的破壞力量，甚至一定程度上肯認了這個運動場域的重要性。

66 受訪者 A017、A033。

立法院的現場，成為這場支撐住佔領狀態的一部分，即便有所不滿也不會輕易離開。

除了從運動構框的角度切入分析，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在規劃這場佔領行動之初，並未預期能夠成功佔領這麼大範圍且持續多天。面對這場運動預期外的規模和群眾能量，因此許多有經驗的行動者認為應該放下手邊的工作、貢獻己力。由於自 2012 年累積堆疊的抗爭風潮，高張力的群眾行動已經在不同議題當中經歷，至太陽花佔領被視為是抗爭行動規模的高峰點。對於當時馬英九政府的不滿，乃至於對於廣義的「民主」捍衛，在看到人們以「佔領」作為具體挑戰代議民主、實踐人民主權的作為，以及看見日日夜夜群眾在街頭靜坐輪班時，彷彿體現了運動者對於「草根民主」、「人民力量」的想像，而讓長期參與運動的行動者認為自己也必然要參與其中。運動者自身浮現的「責任感」，以及希望把握難得高度凝聚的街頭能量進行培力及倡議，認為不能在這一場運動當中缺席的「參與感」，是不同利益相關方都投入其中的重要因素。這種實踐運動理想的效能感，使得行動者即便在衝突及負面感受中對運動抱持批判，仍認為應投身其中。

佔領當中的行動者除了正面表述為何想要留在這場運動，更重要的是在行動過程中產生了負面的感受，卻決定「相忍」下來，仍然繼續為這場運動付出。無論是單一次群體之內，或是群體與群體之間，在佔領的節奏與龐大的工作任務中，不免有著各種摩擦與衝突存在。除了前面已經提及社運組織的開會文化與學生有落差，佔領過程當中以「議場內、議場外」作為區隔，也引發了不同位置行動者之間的「矛盾」。

「佔領行政院」行動更是整個運動過程當中最大的行動分歧與行動者之間衝突的來源。不過，無論是核心領導者或是其他運動幹部，許多人在提到這場行動的鎮壓時，都會指出應該將主要批判標的放在下令指揮的政府官員，也就是應該將更大的力氣放在批判國家暴力，而不只是行動者之間的相互指責。「佔領行政院」所遭受到的鎮壓使得行動者們更能夠指認敵人（國家暴力），非意圖地促成了行動者們

在佔領運動當下必須團結一致。包括有受訪者認為三三〇的大遊行能夠動員出相當龐大的規模，反映了群眾對於政府鎮壓「佔領行政院」行動的憤怒。然而，在訪談過程中，大多行動者會謹慎地回答關於這場行動的感受和評價。部分社運組織或青年學生的行動者，則在訪談中明確提到他們並不全然認同「佔領行政院」行動，尤其是對於領導這場行動的核心幹部所做的政治判斷，以及他們與其他次群體之間的互動關係。不過，即便有許多行動者心懷不滿或委屈，他們仍都選擇留在這場運動當中，並未因為運動策略的分歧而在佔領過程中引發對運動具有傷害性的衝突。

另外，太陽花佔領行動以多方行動者協力的形式展現，也說明了何以在面對佔領期間最大的決策與行動上的分歧點「佔領行政院」行動之後，整體運動並沒有因為分裂而潰敗。除了原來就在佔領行動核心網絡內的成員之外，也有許多自認不屬於權力核心、也不屬於想要挑戰權力核心的「社科院派」之外的行動者，他們並不只是靜坐及聲援，而是在現場許多的庶務工作當中，擔負起一定的工作責任的積極成員，甚至在現場成為某些區域或工作任務的中層幹部。當「佔領行政院」事件發生，領導核心及學生群體之間出現行動路線的分歧，這些在現場維持日常運作秩序的中層幹部們仍堅守自己的位置，並未因為局勢改變而離開這場運動，成為在佔領現場中一股穩定的力量。

社運組織、不同次群體與擁有各級權力的幹部都在這場佔領運動當中找到能夠發揮功能的角色，並且在面臨分裂的危機後，採取更加緊密地現場分工關係，讓結盟關係可以更加鞏固，而不至於讓政權有機會破壞運動。因此，本文描繪出社運團結的內涵，即是主觀集體認同的行動化，表現在促成社運組織內部達成趨向一致的政治判斷，並展示集體行動的意願與實際行動。在上述的說明當中，便更彰顯出共同政治判斷的重要性，能夠在運動瀕臨潰散時仍然保持凝聚，在分歧的運動路線與多元次群體狀態下，運動內部仍然有集體意願並具體行動來延續佔領立法院的成果。

## 六、結論：詮釋「團結」的意義

本文參照了波蘭以團結工聯為樞紐的團結，凸顯了以「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為主軸的社運組織在太陽花佔領行動當中的團結樣貌。縱使這場運動被廣泛的稱之為一場「學運」，然則無論從抗爭事件的堆疊累積，或從佔領現場微觀的視角觀察，這些以議題性為主的社運組織在佔領行動中仍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從佔領後街頭抗爭場面的維繫，以及「三三〇大遊行」的籌備。「我們 NGO」作為一種認同符碼，表現了社運組織在這場佔領運動中，有別於「學生」的集體認同。運動過程中，不僅在會議上有明確的切分出屬於社運組織的角色，這個次群體內部還有其長期分工、合作所形塑的文化；而在與其他群體間的差異以及衝突、溝通的來回互動中，更加凸顯了 NGO 本身的集體性和凝聚力。這種在短時間內爆發具有高效率的合作型態，則奠定於幾年來共同工作的集體行動基礎，包括共同的抗爭經驗、文化形塑、情感連帶以及組織間互相分工的默契。

衝突和分歧，是大型運動過程中經常存在的現象，也是整體「團結」內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過，無論是靠近權力核心的學生領袖及社運組織，或是運動權力較為外圍的群體，都沒有因為運動內部的策略分歧而導致「佔領立法院」這個「主場」的分裂。又或者，即便面對彼此不信任、甚至分裂的危機，最後也沒有讓衝突檯面化，而讓當時的政權有機會破壞這場佔領主要行動者之間的結盟合作。相反地，NGO 認同反而緩和了運動內部潛在可能造成分裂的衝突。「我們 NGO」這個次群體懷抱著有別於學生的集體認同，但仍與多數佔領現場的學生與群眾有著相似的運動目標。無論是世代間的分歧、抗爭秩序觀的差異或者運動路線的分歧，都在彼此基於「維持佔領」此一特殊抗爭劇碼下所打造的獨特運動型態和抗爭籌碼，讓所有參與的成員緊密鑲嵌在運動場域當中，且做出讓步和妥協，使得整體運動並未因為「分群」而走向「分裂」。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團結」，便可



以再分成兩種不同層次：每個次群體「內部的團結」，以及不同次群體「之間的連結」。社運組織之間的團結較為主動、積極，在運動中催化為高度團結共同體；次群體之間的連結度和緊密程度較淺，具有消極的「相忍」特質，也在整體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若沒有既存的結盟經驗，面對（部分學生）排擠的 NGO 團體，是否就無法形成團結？換言之，「排擠」與「團結」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嗎？<sup>67</sup> 我們認為，若沒有既存的結盟經驗與集體認同，即便有「排擠」現象發生，NGO 也無法在有高度工作量且需要密集分工的佔領現場達成團結。更進一步推想：若沒有既存結盟經驗與集體認同，而當「排擠」現象發生時，更可能發生的結果是社運團體選擇「退出」抗爭行動現場。再者，我們在前文第五節，引用了多個社運組織在「佔領內政部」、「反核遊行」的合作經驗；根據這些行動者自述，過往的結盟合作經驗與相互肯認的集體認同，對太陽花佔領的團結合作發生很大影響，這些證據也呼應了本文第四節描繪佔領行動以前，網絡內部更加凝聚的結盟趨勢。因此，被學生排擠僅僅是促成團結的、作為偶發因素的「催化劑」；奠基在過去抗爭的結盟經驗，才是集體認同鞏固、上升至團結局面的主要條件。

本文從組織作為分析主體的視野出發，將太陽花運動置於 2012 年開始的抗爭風潮位置來分析。我們發現，集結眾多社運組織及跨議題參與的集體抗爭，通常是每年固定時間會舉辦的「週期性事件」，但此外，從 2012 年的「鍾鼎邦事件」、2013 年的「大埔事件」到「國民黨全代會丟鞋事件」，我們也觀察到整體網絡也發展出由「非週期性事件」所打造的社運團體集結模式，突破既有以「週期性事件」為主軸的結構。社運組織行動者的自我認知（通過我們對太陽花佔領過程的微觀分析）也與網絡分析的結果相符合：2012 與 2013 年密集且高強度的抗爭經歷，構成了後來群體成員合作互動的基礎。最後，到了本文網絡分析時間段的終點，也就是 2014 年 3 月的太陽花

---

67 感謝審查者的提問。



佔領行動，社運組織網絡中的凝聚子群達到一個高峰，代表著整體網絡的相互交織及穩定性。這說明了何以我們選擇解釋太陽花運動作為論述「社運團結」的主軸事件。

從社運組織的敘事觀點出發來理解太陽花佔領現場的動態，則讓我們進一步描繪出行動者表現出來的「團結」內涵。太陽花運動中的團結也不僅止在佔領過程中發揮作用，整體社運組織社群的凝聚力和結盟的程度，也顯示了團結的效應至少延續到佔領結束後的一到兩年之間。太陽花佔領事件代表這段抗爭週期的高峰嗎？後太陽花是否立即呈現抗爭下降的趨勢？社運團結是否只是個「短命」的現象？<sup>68</sup> 本文作者之一許恩恩在後續分析抗爭參與網絡的研究中，發現從 2012 年至 2018 年，社群凝聚力的高峰是在 2015 年。事實上，從 2012 年至 2016 年初民進黨上台前都是上升階段（ascending phase）。詳細討論可參見許恩恩（2019）碩士論文第四章〈社運組織網絡的變遷軌跡（2012-2018）〉。太陽花運動顯現的社運團結並非「短命現象」，最明顯的例證，即是佔領結束後不久發生的「反核四佔領忠孝西」事件，主事的社運組織幹部認為，這次籌備團隊的多元度已經突破了過去反核遊行範疇，而其參與廣度與深度都受到太陽花佔領行動影響。<sup>69</sup> 有非環保組織的幹部提到這場行動的策劃中，社運組織的工作狀態是延續太陽花時期的緊密合作型態，因此非常有默契，很快地能夠認領分工和執行。又例如 2015 年反課綱佔領教育部時，社運組織也有共識地以輔助學生的角色參與在其中。太陽花佔領行動後的幾場大型抗爭行動，社運組織之間的合作都有受到佔領時期的共同經驗影響。

過往文獻當中經常將「團結」與「集體認同」概念交疊使用。本文在 Gamson（1991）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化「團結」的定義：主觀集體認同的行動化，表現在促成社運組織內部達成趨向一致的政治判

---

68 感謝審查者的提問。

69 受訪者 A057。

斷，並展示集體行動的意願與實際行動；也表現在不同社運組織之間的結盟關係並採取一致性集體行動。Tarrow（2011）將社運團結置於集體認同、構框、情感的交集中加以分析。本文受其啟發，也從這些向度檢證太陽花佔領行動，透過「我們 NGO」這個敘事者觀點的集體行動脈絡，將其在佔領過程中的分工實踐，以這三個元素做深度的連結與詮釋。本文的個案經驗分析，豐富了社會運動有關團結與團體結盟的文獻。團結必須透過實作的行動化過程才能達成，而不僅僅止於彼此之間的高度認同感。眾多社運組織在許多次抗爭中磨合互信基礎，才能夠在高張力的太陽花佔領中共事合作。

總結而言，社會運動經常面臨分歧與分裂的張力，因此「團結」對於社運研究而言是一項關鍵議題。我們的研究發現，團結之所以珍貴，在於其能夠抵禦分裂的危機。社會運動遭遇分裂危機一個主要來源即是國家的鎮壓。太陽花佔領行動過程中經歷最嚴重的危機就是「佔領行政院」事件的鎮壓，既有文獻指出，鎮壓——或更廣泛地說，對社會抗爭的威脅——既可能產生抗爭群體的分裂（della Porta 2006[1995]），亦可能有助於結盟的發生（Van Dyke 2003）。從此角度觀之，本文主要貢獻是，跳出這類運動外部環境的對立爭論，深入外部因素跟組織動員之間的中間層，提出細緻的過程解釋，明確指出在運動群體已具備抗爭合作經驗所擁有的信任基礎下，國家鎮壓為何沒有破壞社運團體之間的信任關係，反而更進一步在危急時刻促成團結。因此，社運網絡關係讓多元運動者群體在危機局面下仍然能夠凝聚出團結。這個角度 Gamson 與 Tarrow 皆有觸及、但尚未細究。我們根據深度訪談資料，從微觀層次指出：抗爭過程中，鎮壓／威脅（佔領行政院事件）促成結盟關係鞏固的互動過程。

從廣義的理論貢獻而言，本文證實：社運團體既存的合作關係與網絡連帶，有助於在類似太陽花佔領如此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中，形塑並擴大論述框架，促成更大範圍的團體結盟，在共同面臨危機威脅時凝聚集體認同感，鞏固團體之間與團體內部的信任關係，而促成社運團結的局面。

我們從 Osa 研究「團結工聯運動」的專書中得到啟發並與之對話。Osa 指出波蘭反對運動的突破，在於從 1970 年代中後期開始，知識分子等團體對政治體制與局勢的再評估，強調自主性與國族文化發展，在天主教與波蘭民族的共同體基礎上，提出一個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集體行動）框架」（Osa 2003: 132-133），延伸了在「我們對抗他們（波蘭天主教國族對抗蘇聯支持下的波共黨政警體系）」（us-versus-them）的主框架（Osa 2003: 77-78, 177-79）。從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公民社會逐漸作為集結抵抗力量的集體行動框架，容納了工人組織（團結工聯 Solidarność）、公民團體（工人防衛委員會 KOR 等）、波蘭天主教會組織、民族主義團體與其他組織（Osa 2003: 154-68）。「團結工聯運動的巨大成就是創造了一個社會範圍的結盟，強壯到足以從列寧主義政權手上取得史無前例的讓步」（Osa 2003: 181）。團結工聯運動對抗的是，一個在冷戰時代的蘇聯控制下的波共威權政府；台灣太陽花運動則是在後冷戰時代，抵抗一個在中國巨大影響力下的新興民主國家的「向中國傾斜的政府」。本文使用較為細緻的網絡測量，仔細檢證了這段期間內社運組織網絡關係變化，確定了重要社運團體之間的高凝聚力，並且以質化訪談方法詮釋這股凝聚力的內涵。Osa 指認的波蘭團結工聯運動的主框架是「我們對抗他們」，她在網絡意義上的論證較為強調中介性組織角色；與此平行論證，我們指認出的台灣太陽花運動的主框架，則是以公民團體的結盟基礎而磨合出「民主／抗中」（「守護台灣民主」與「抵抗中國影響力」）的主框架，而且同樣是以「公民社會」作為集體行動框架，但本文在網絡意義的解釋上則側重整體社群內部的凝聚力。

文獻回顧中提到 Tarrow（2011）從理論角度將社運團結視作集體認同、情感、構框三者的交集。本文以深度訪談的方法，對這三個環節都進行了分析，我們發現：在台灣的公民社會發展脈絡中，社運圈歷經長期的溝通與合作，逐步建立了社運組織與幹部間的情感分享信任關係，形成連結性較強的社運網絡，磨合出最大包容範圍的主框

架，而能夠在太陽花運動的關鍵階段，提供了「團結誘因」，並在抗爭過程面臨政府嚴厲鎮壓的時刻，把核心團體和幹部綁在一起行動，促成佔領運動持續下去。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在太陽花佔領行動當中，「我們 NGO」作為組織工作者的主體認同符碼，恰當詮釋了他們如何以集體認同作為出發點，具體奉獻熱情於這場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也因其多元包容性，而不致以次群體的形式從主要運動場域中「離開」（exit），亦即分離或分裂。若無「我們 NGO」這個次群體認同的建構，我們就無法瞭解太陽花佔領運動的全貌，也就無法解釋在這場歷史抗爭中社運團結如何形成，以及社運團結對於台灣抗爭運動史的意義。總之，「太陽花」不只是一場「學運」，而是涵蓋更廣闊而持久的一場「公民運動」中的一系列大規模抗爭動員。

誌謝：本文研究與寫作過程，首先要感謝數十位匿名社運參與者願意接受我們訪談，沒有你們的合作並慷慨提供重要資料、訊息與觀點，本文無從完成，論證也不會成立。我們非常珍惜這段研究經驗所帶來的知識上與實踐上的互動與學習過程。感謝林政宇在研究過程提供的協助。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尤其是審查者在查證網絡分析方法之適切性方面所耗費的心力）與《台灣社會學》跨越兩屆編輯委員會所提供詳細的修改意見，讓我們避免錯誤，也豐富了論證。許多學界先進在論文不同階段提供珍貴的評論與建議，因為人數很多無法在此逐一致謝。本研究獲得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經費，計畫名稱：「全球化、中國因素、政經社會變遷、與社會抗爭：台灣與香港的比較」（MOST 104-2410-H-001-075-MY2）、「搜尋政治力位移的因素：社經條件變遷、政治抗爭週期、民意變動趨勢，台灣 2000-2016 年」（MOST 106-2410-H-001-058-MY2）。

## 附錄 1 網絡分析計算方法說明

### （一）射影法與網絡中心性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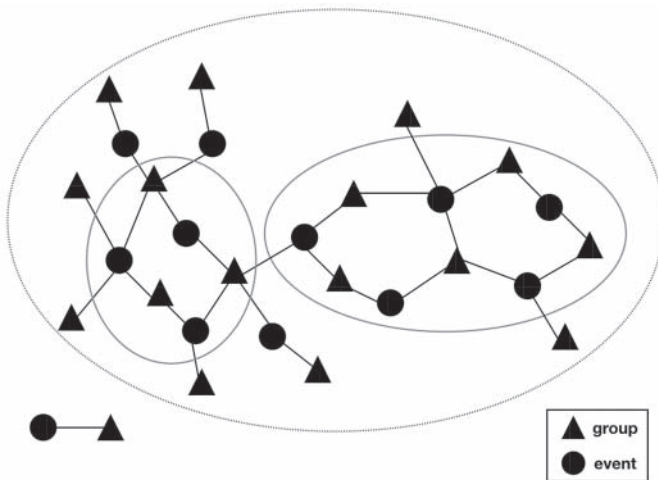
在本文的二元網絡中有兩種截然二分的頂點，分別為抗爭事件與社運組織，而連結只能發生在「跨」類型頂點間，而不能發生在「同」類型頂點間。將二元網絡轉為事件間的單元網絡時，傳統方法會將連結直接依照參與兩個事件的組織數目加總，值愈高表示事件間連結的權重愈高（weighting）、關係愈強，這個方法可以表示為： $w_{ij} = \sum_p 1$ ，其中  $w_{ij}$  表示事件  $i$  與事件  $j$  間權值， $p$  表示同時參加過兩個事件的組織。Newman（2001）在其學術論文的合作網絡中延伸此一觀點，他認為兩個學者在單篇論文上的合作強度應該與論文的合作人數呈反比。依照其論點，學者間合作關係的權重可以表示為： $w_{ij} = \sum_p \frac{1}{N_p - 1}$ ， $N_p$  為論文  $p$  的合作人數。換句話說，一篇論文如果有多人協作，則任意的兩個學者間的合作強度較低。這個方法能有效避免因傳統射影法轉換後對頂點連結數量的高估，而影響網絡指標的計算（Opsahl 2013；Opsahl et al. 2010）。

將雙元網絡轉換成單元網絡進行計算。原始單元網絡的點度計算可以表示為： $D_i = \sum_j x_{ij}$ ， $x_{ij}$  表示頂點  $i$  與  $j$  間存在連結，加總後的值  $D_i$  即為頂點  $i$  的點度。在加權網絡中可以簡單的延伸如下： $D_i^w = \sum_j w_{ij}$ ， $W$  表示加權鄰近矩陣（adjacency matrix），如果  $w_{ij}$  為 0 表示頂點  $i$  與  $j$  間沒有連結，大於 0 則表示頂點間有連結，值愈高表示連結的強度愈高。中介中心性則可以表示為： $B_i = \frac{g_{ji}}{g_{jk}}$ ， $g_{jk}$  表示任意兩個頂點間最短路徑的數量，而  $g_{ji}$  表示任意兩頂點最短路徑中有通過頂點  $i$  的數量，當頂點愈位於中介位置時，中介中心性也隨之增加。在加權網絡中，可以將權值視為連結所需要付出成本與代價，權值愈低表示兩個頂點間的連結成本愈高，依此可以將兩頂點間的最短加權距離表示為： $d_{ij}^w = \min \left( \frac{1}{w_{ih}} + \dots + \frac{1}{w_{hj}} + \right)$ ，其中  $h$  表示頂點  $i$  與  $j$  之間的

中介頂點。最後，只要以加權後的最短路徑重新帶入中介中心性的公式即可，為了更好的呈現結果，我們將中介中心性的尺度重新調整為 0-100 之間。

## （二）組元與雙組元

組元（component）內任兩個頂點間都至少有一條可以互相通達（connected）的路徑，雙組元（bicomponent）則是任兩個頂點間有不只一條路徑可以到達彼此。下圖為示意圖，圓形和三角形是模擬事件和組織頂點。最外圍圈起的部分是一個組元，中間兩環圈起來的都是雙組元。以圖中的「最大雙組元」，也就是右邊圈起來的部分為例，其子群體中的頂點皆有不只一條的路徑可以到達彼此，不會因為缺少單一頂點而使子群體崩解。最大雙組元的頂點數以及其佔整體網絡的比例即是本文第四節繪圖所使用的測量。





附錄 2 受訪者一覽表

編碼	性別	年齡區間	是否屬於 任何社運組織	是否為 「民主陣線」成員
A001	男	30 歲以下	是	否
A002	男	30 歲以下	是	是
A003	男	30 歲以下	是	是
A004	女	30 歲以下	否	否
A005	男	30 歲以下	否	否
A006	男	30 歲以下	是	是
A007	女	30 歲以下	是	是
A008	男	30 歲以下	是	是
A009	女	30 歲以下	是	是
A010	男	30-45 歲	是	否
A011	女	30 歲以下	是	否
A012	女	30 歲以下	是	否
A013	男	30 歲以下	否	否
A014	女	30-45 歲	是	是
A015	男	30-45 歲	是	是
A016	男	30-45 歲	是	是
A017	男	30-45 歲	是	是
A018	男	30-45 歲	是	否
A019	女	30 歲以下	是	否
A020	女	30-45 歲	是	是
A021	男	30-45 歲	否	否
A022	女	30-45 歲	是	是
A023	男	30-45 歲	是	否
A024	男	30 歲以下	是	是
A025	男	30 歲以下	是	否
A026	男	45-60 歲	是	是
A027	女	30-45 歲	是	是
A028	男	30 歲以下	是	否
A029	女	30-45 歲	是	否
A030	男	30 歲以下	是	否

編碼	性別	年齡區間	是否屬於 任何社運組織	是否為 「民主陣線」成員
A031	男	30-45 歲	是	是
A032	女	30 歲以下	是	否
A033	男	30-45 歲	是	是
A034	男	30-45 歲	是	否
A035	男	30 歲以下	是	否
A036	女	30 歲以下	是	否
A037	女	30 歲以下	否	否
A038	男	45-60 歲	是	是
A039	男	30-45 歲	否	否
A040	男	45-60 歲	是	是
A041	女	30-45 歲	是	是
A042	女	30 歲以下	是	是
A043	男	30-45 歲	是	否
A044	男	30 歲以下	否	否
A045	女	30 歲以下	否	否
A046	女	30 歲以下	否	否
A047	女	30 歲以下	否	否
A048	男	30-45 歲	是	否
A049	女	30-45 歲	是	否
A050	男	30 歲以下	否	否
A051	男	45-60 歲	是	是
A052	女	30 歲以下	否	否
A053	男	30 歲以下	是	否
A054	男	30 歲以下	是	否
A055	女	45-60 歲	是	是
A056	男	45-60 歲	是	是
A057	女	30-45 歲	是	是
A058	女	30-45 歲	是	是
A059	男	45-60 歲	是	否

附錄 2 列表中，受訪者所屬社運組織有：公民 1985 行動聯盟、公民組合、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勞工陣線、台灣農村陣線、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民主黑潮、地球公民基金會、原住民族青年陣線、捍衛苗栗青年聯盟、基進側翼、婦女新知基金會、國立台灣大學工會、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醫師勞動條件改革小組。

## 參考文獻

- 自由時報，2014，〈「台灣之春」歐媒高度關切〉。胡蕙寧報導，3月22日（<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64239>，取用日期：2018年1月25日）。
- 何明修，2001，〈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1980-1986）〉。《台灣社會學》2: 97-162。
- ，2005，《社會運動概論》。台北：三民書局。
- ，2016，《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台北：左岸文化。
- 吳介民，1990，《政體轉型期的社會抗議：台灣1980年代》。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2014，〈港台的抵抗運動為何呈現趨同性？〉。《文化研究》18: 170-177。
- 吳介民、廖美，2016，〈佔領，打破命定論〉。頁115-161，收錄於林秀幸、吳叡人編，《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和視域》。台北：左岸文化。
- 李宗榮，2007，〈在國家權力與家族主義之間：企業控制與台灣大型企業間網絡再探〉。《台灣社會學》13: 173-242。
- 林宗弘，2015，〈台灣階級不平等擴大的原因與後果〉。《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45(2): 45-68。
- 林秀幸、吳叡人編，2016，《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和視域》。台北：左岸文化。
- 林傳凱等，2016，《2014年323政院抗爭事發過程陳述》（<https://google.com/9unwJo>，取用日期：2018年1月25日）。
- 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運動全紀錄》。台北：允晨文化。
- 許恩恩，2019，《結盟、團結與分歧：變遷中的台灣社運組織網絡》。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婉琪、黃樹仁，2015，〈立法院外的春吶：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象〉。《台灣社會學》30: 141-179。
- 陳婉琪、張恒豪、黃樹仁，2016，〈網絡社會運動時代的來臨？太陽花運動參與者的人際連帶與社群媒體因素初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8(4): 467-501。

- 彭仁郁，2016，〈反叛中建構的主體：三一八公民運動中所彰顯的象徵秩序傳承〉。頁 325-372，收錄於林秀幸、吳叡人編，《照破：太陽花運動的振幅、縱深和視域》。台北：左岸文化。
- 劉華真，2010，〈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勞動抗爭初探〉。《台灣民主季刊》7(1): 31-63。
- 劉華真，2015，〈研究社會抗爭〉。論文發表於「學生運動與社會正義」：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二十週年所慶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5 年 5 月 29-30 日。
- 賤民刊物編輯小組編，2016，《賤民解放區 2014-2015：318 佔領運動以及其後》。台北：賤民解放區。
- Graeber, David 著、李尚遠等人譯，2014，《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台北：商周。（Graeber, David. 2012. *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 London: Penguin.）
- Abul-Fottouh, Deena and Tina Fetner. 2018. "Solidarity or Schism: Ideological Congruence and the Twitter Networks of Egyptian Activists." *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23(1): 23-44.
- Au, Anson. 2017. "Collective Identity, Organization, and Public Reaction in Protests: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Social Sciences* 6(4): 150.
- Bearman, Peter S. and Kevin D. Everett. 1993.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Protest, 1961-1983." *Social Networks* 15(2):171-200.
- Borgatti, Stephen P., Martin G. Everett, and Jeffrey C. Johnson. 2013. *Analyzing Social Network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della Porta, Donatella. 2006[1995].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ani, Mario and Doug McAdam, eds. 2003.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Linton C. 1978.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Social Networks* 1(3): 215-239.
- Gamson, William. 1991. "Commitment and Agency in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6(1): 27-50.
- Hirschman, Albert O. 198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 Ming-sho. 2015. "Occupy Congress in Taiwan: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reat, and

- the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5(1): 69-97.
- . 2018. “From Mobilization to Improvisation: the Lessons from Taiwan’s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7(2): 189-202.
- . 2019. *Challenging Beijing’s Mandate of Heave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and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su, Szu-chien. 2017. “The China Factor and Taiwan’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the Sunflower Movement: The Case of the Democratic Front Against the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 Pp. 134-153 in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under Ma Ying-jeou: From the Wild Strawberries to the Sunflowers*, edited by Dafydd Fell. New York: Routledge.
- Hunt, Scott A. and Robert D. Benford. 2004. “Collective Identity, Solidarity, and Commitment.” Pp. 433-457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Oxford: Wiley-Blackwell.
- Ishchenko, Volodymyr. 2016. *The Ukrainian Left during and after the Maidan Protests*. Working Paper of European Parliamentary Group: European United Left/Nordic Green Left.
- Jasper, James M. 2011.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Twenty Years of Theory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7: 285-303.
- Kossinets, Gueorgi and Duncan J. Watts. 2006. “Empirical Analysis of an Evolving Social Network.” *Science* 311(5757): 88-90.
- . 2009. “Origins of Homophily in an Evolving Social Networ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5(2): 405-450.
- Lee, Francis L. F. and Joseph M. Chan. 2018. *Media and Protest Logics in the Digital Era: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 Hong Ko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Brian. 2009. “Cross-Movement Coalition Formation: Bridging the Labor-Environment Divide.” *Sociological Inquiry* 79(2): 219-239.
-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elucci, Alberto. 1989.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edited by John Keane and Paul Mier.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oghadam, Valentine M. 2012.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Islamism, Feminism, and the Global Justice Movement*.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Moody, James. 2004. "The Structure of a Social Science Collaboration Network: Disciplinary Cohesion from 1963 to 199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9(2): 213-238.
- Moody, James and Douglas R. White. 2003. "Structural Cohesion and Embeddedness: A Hierarchical Concept of Social Group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8(1): 103-127.
- Newman, M. E. J. 2001.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Networks. I.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Fundamental Results." *Physical Review E* 64(1): 016131.
- Onuch, Olga and Gwendolyn Sasse. 2016. "The Maidan in Movement: Diversity and the Cycles of Protest." *Europe-Asia Studies* 68(4): 556-587.
- Opsahl, Tore. 2013. "Triadic Closure in Two-mode Networks: Redefining the Global and Local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Social Networks* 35(2): 159-167.
- Opsahl, Tore, Filip Agneessens, and John Skvoretz. 2010. "Node Centrality in Weighted Networks: Generalizing Degree and Shortest Paths." *Social Networks* 32(3): 245-251.
- Osa, Maryjane. 2003. *Solidarity and Contention: Networks of Polish Oppositio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olletta, Francesca and James M. Jasper. 2001.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 283-305.
- Snow, David A. 2004. "Framing Processes, Ideology, and Discursive Fields." Pp. 380-412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Oxford: Wiley-Blackwell.
- Tarrow, Sidney. 2011.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Verta and Nancy E. Whittier. 1992. "Collective Identity in Social Movement Communities: Lesbian Feminist Mobilization." Pp. 104-129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orrents, Jordi and Fabrizio Ferraro. 2015. "Structural Cohesion: Visualization and Heuristics for Fast Computation."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16: 1-35.
- Uzzi, Brian, and Jarrett Spiro. 2005.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ity: The Small World Proble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2): 447-504.
- Van Dyke, Nella. 2003. "Crossing Movement Boundaries: Factors that Facilitate Coalition Protest by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1930-1990." *Social Problems* 50(2):

226-250.

- Wang, Dan J. and Sarah A. Soule. 2012.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of Learning and the Diffusion of Protest Tactics, 1960-1995."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7(6):1674-1722.
-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y, Lucan. 2014. "The Maidan and Beyond: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25(3): 35-43.
- Weldon, S. Laurel. 2006. "Inclusion, Solidar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Global Movement against Gender Violenc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4(1): 55-74.
- Wu, Jieh-min. 2019. "Taiwan's Sunflower Occupy Movement as a Transformative Resistance to the 'China Factor.'" Pp. 215-240 in *Take Back Our Future: An Eventful Sociology of Hong Kong's Umbrella Movement*, edited by Ching Kwan Lee and Ming S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Yang, Chia-ling. 2017. "The Political is the Personal: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6(6): 660-671.